



“曹祥泰”创始于1884年，“曹祥泰、不愁卖”传誉天下，尤以绿豆糕享有盛名。2012年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13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老通城”创始于1929年，享有“豆皮大王”美誉，荣获中国饮食行业最高奖“金鼎奖”。2015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2009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萌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姚四平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严濂

编辑：许濛 郑雅飞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 4 “曹祥泰”的百年风华 / 卢耀武
- 9 “老通城”的艰辛创业之路 / 曾宪德

九城同心

- 15 黄冈历史文化简介 / 李青松
- 17 黄冈共存社独立展开建党活动 / 董志伟 史智鹏
- 22 黄梅戏“回娘家”四十年 / 章华荣

三镇拾遗

- 27 围着铜人像转一转 / 潘莫元
- 31 汉口老里份“东山里”题刻初探 / 胡全志

目录

CONTENTS

委员天地

- 34 拧紧人生发条，干出青年政协委员的样子
/ 王涛（口述）王欣然（整理）
- 38 黄鹤振羽，古城新貌背后的政协力量 / 亢德芝

商聚汉皋

- 42 奔跑者的足迹 / 杨须红
- 46 大健康产业的逐梦者 / 李德兰（口述）严 濂（整理）

都市史话

- 50 武钢 1 号高炉的使命与光荣 / 钟 钢
- 56 东湖风景区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 童汉芳

史海钩沉

- 61 旧时武汉商行的行话暗码 / 杨普社 张丽琴 熊恒多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曹祥泰”的百年风华

◇ 卢耀武

【老字号小档案】

“曹祥泰”创始于1884年，已有138年的历史，坚持诚实经营、周到服务、和气生财，留下“曹祥泰、不愁卖”的良好口碑，传统工艺制作的“祥”字牌糕点畅销不衰，尤以绿豆糕享有盛名。

武汉解放后，“曹祥泰”不断壮大规模，从手工到机械化，从小作坊到食品厂，在同行业中敢争第一。2001年改制成立武汉曹祥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武汉副食

品行业唯一一家用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的老字号企业。2012年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13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评为“优秀创新企业”。

“曹祥泰”砥砺前行，以老字号带产品，以产品壮大老字号，扩大市场占有率，继续赢得消费者的口碑，为传承和振兴武汉老字号作出新贡献。

武汉曹祥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为闻名海内外的曹祥泰杂货店，已有138年的历史。“曹祥泰、不愁卖”是顾客的评价，“跌在人前，涨在人后”是商店的法宝，因此“祥”字牌糕点至今畅销不衰，依然显现百年老店的独有风采。

1863年（清同治二年），“曹祥泰”创始人曹南山开始提篮叫卖，1884年（清光绪十年）开办曹祥泰杂货店。一个多世纪以来，曹家三代人走过了提篮子、挑担子、摆摊子、开店子、办厂子的艰辛创业之路，

1949年后几代员工经历了公私合营、联购分销、计划供应、承包经营、企业改制的发展里程，其经营业绩稳居同行业第一。1997年进入全盛时期，营业额为2020万元，上交税金167万元，利润112万元。

传奇发家

曹南山是武昌卓刀泉人，13岁那年父亲去世，遗下母亲和两个弟弟，无以为生。曹南山向街邻借钱，以几升蚕豆炒熟提篮

叫卖，维持生计。他卖蚕豆时，用竹筒装满后不像别人用手刮平，而是再抓一把给你，比别的小贩慷慨，人称“曹大把”——这应该算是曹家第一个品牌吧。

曹南山逐渐有了积累，经营起了干果、水果生意，由提篮子到挑担子，进而摆摊子。他的两个弟弟相继长成参与经营，三兄弟各有专长，二弟善贩运桃子，三弟善储藏秋波梨，曹南山则擅长盘西瓜。

清光绪年间，有一年六月连下阴雨，河里运来的西瓜大量积压船上。曹南山判断久雨必久晴、晴后必热，于是力排众议，用几串钱买回两大船西瓜，自己的小屋堆不了，还堆满邻居的堂屋。不久，天气连日放晴果然酷热，西瓜价格陡涨。当时正值“秋闹”之期，各州县的考生云集省城武昌，曹南山“奇货可居”，西瓜由几个钱一斤涨到几十个钱一斤，最后到一串钱一斤，两船西瓜竟赚了400多串钱，曹南山有了起家的本钱。

1884年（清光绪十年），曹南山在武昌后长街的新街口，开设了一家杂货店，请了一个伙计，招了两个学徒，挂起了“曹祥泰”招牌，取吉祥安泰之意，开始经营水果、干果、杂货、炒货，后又增加大米、五金、铁器等。

一段时期后，兄弟三人分家，二弟经营茶叶，三弟经营杂货米店，但两个弟弟均无多大发展，曹南山的店子也失火毁于一旦。曹南山向汉口铁号借银3000两，将店址迁移到更为繁华的长街（即现址武昌解放路417号）复业，长子曹云阶接手实际负责经营，当年还清欠债并有盈余，“曹祥泰”步入发展的成熟期。



“曹祥泰”店铺前排队的景象

多业扩张

1910年，“曹祥泰”开办福记杂货店、禄记米店、寿记钱庄、喜记槽坊，资金总额一万两银子。

这时候，杂货业已相当发达，各店收进的铜元很多，而一般居民又需要铜元零用，往往拿“官票”换杂货店的铜元，而官票与铜元之间是有“差价补水”的，杂货店可以从中获利，久而久之杂货店就兼营兑换业务。

“曹祥泰”由兑换业务发展到开设寿记钱庄，钱庄除兑换银子、光洋、龙票外，还吸收社会存款。市民认为“曹祥泰”有店子、有厂子靠得住，因此存款生意也很兴隆。恰好省库“湖北省官钱局”（现省工商银行旧址）就在对面，“曹祥泰”和官钱局的师爷经常往来。由于政治腐败、贪污盛行，各州县的厘金局长将钱粮厘金上缴省库之时，顺便把搜刮来的钱用私人名义存入寿记钱庄。

寿记钱庄的大量存款，对杂货店、工厂的资金运用、业务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钱庄还将存款放给官商合办的企业，如“永光拖轮公司”“湖北官砖厂”“厘金局”等。

遇上政局变动，官僚们的存款要提现，而钱庄贷给官办企业的钱都收不回来，钱庄所欠债务达30万元左右，超过了“曹祥泰”流动资金的总额。当时武汉钱庄倒闭颇多，但“曹祥泰”所属企业都获了厚利，抽调光洋十三万六千余元、纹银一万一千五百余两，偿还了钱庄的债务，钱庄顺利结束。

“曹祥泰”在汉口汉正街永宁巷开设了一家分号，它的房子用厚青砖砌成，防火性能好，衍生了一个武汉广为流传的歇后语：“曹祥泰的房子——两墙（两强）。”大意是生意左右逢源、两头赚钱，反映了其经商智慧和生存法则。

1911年辛亥革命后，曹南山的次子曹琴萱进了杂货店，他是武昌第二中学的学生，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之志。这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发展机会，“曹祥泰”拿出积累的资金开始投向工业。1915年在武昌都府堤创办祥泰肥皂厂，1917年在汉口龙王庙开办曹祥泰西号（后改为祥泰新百货号亦是祥泰肥皂发行所）。1921年在汉口沈家庙创办祥

泰禄记机米厂，1922年开办了铭新纽扣厂，1928年开办了经新针织厂。1932年开办的申新香皂厂，到抗战前夕资产70万元，年产12万箱，占武汉市场70%的份额，还远销省外及南洋。

1932年，“曹祥泰”在本店炒房的基础上增设糕饼房，奠定了前店后厂的格局，它生产的小麻饼、小麻叶、蛋糕、芝麻糕、绿豆糕、酥糖、京果、喜饼等糕点，由于选料认真、生产规范、货鲜味美，深受广大顾客欢迎。尤其是喜饼价廉物美，三郊六县凡逢年过节、结婚生子、建房上梁，老百姓都要到“曹祥泰”用箩筐挑喜饼回家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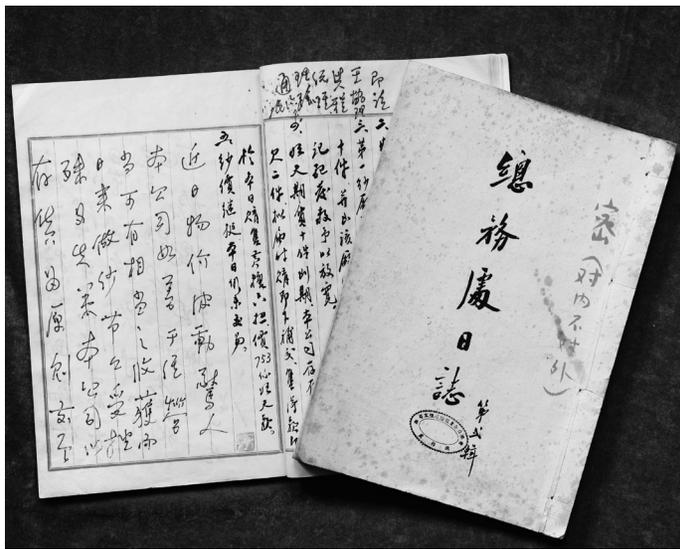
1936年“曹祥泰”职工60多人，流动资金三四万银元，批零生意三七开，日平均销售八百至一千银元，年利一万多银元。

国破店衰

1938年10月日寇逼近武汉，“曹祥泰”抽出肥皂厂资金买港汇37万元，购进皮油4000担、椰子油500担、香油6000余磅、卷筒纸60000磅、玻璃纸2000令存放在英商洋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全部被日寇掠夺。米厂机器在西迁途中或被炸或被日寇劫走，未能搬走的锅炉被敌伪掠夺，厂房被炸毁。

武汉沦陷后，肥皂厂被日寇日华油厂占用，原料及半成品被日寇侵吞，生产军用肥皂。经新针织厂的全部机器设备也被日寇搬走，厂房全部被炸。曹祥泰杂货店也被日寇强占，改为“海军酒保”（即海军酒吧）。

曹云阶被迫改名为“吴云春”隐居汉口法租界伟英里28号，以图东山再起。大部分店员被遣散，只有少数



“曹祥泰”曾经的总务处日志

高级店员在汉正街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取名“同福和”，后被炸毁。肥皂厂的一些职员，在伟英里开了一家“和丰百货号”，借以维持生计、保存骨干。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曹祥泰”全部企业只剩下肥皂厂的厂房和杂货店的店房两个躯壳。曹云阶筹集资金，召集店员，终在1946年元月重新开张，并将店子交给长子曹美成主持。

作为曹家第三代掌门人，曹美成曾在香港私立广州大学政治系学习，1941年经柳亚子介绍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被选为中央青年委员。他广交民主进步人士，具有正义感。1946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他在沧州饭店招待记者，揭露国民党官员在武汉大“劫收”，并推行苛捐杂税、放高利贷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

曹美成精明干练，很快熟悉了业务，日常运作基本上委托管事（经理）杨丽生代办，但“大权不让，小权下放”，建立起“行市”“业务”“财务”“总务”四大日志，他每天亲自圈阅签字。由此，店子保持了兴旺稳定的势头，三年后资金又恢复到三万银元左右。但肥皂厂的复业却障碍重重，先是国民党当局栽赃，说肥皂厂是敌伪逆产要没收，经曹琴萱向接收人员贿赂金条和银元，才将厂房收回，延迟到1947年7月复业，经营举步维艰，连续三年亏损，经变卖香港的房产才勉强维持。

老店新姿

武汉解放后，“曹祥泰”发展壮大，在同行业中一直处于排头地位。

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曹美成刚解放就出任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

1950年3月又委派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曹美成采纳职工建议，出售伟英里房屋一栋，拿出3000万元增资开设分店。1956年5月26日，曹美成亲自敲锣打鼓，向主管机关报送“曹祥泰”公私合营的喜报。

“曹祥泰”从此取得飞跃发展，突破原有生产工艺的局限性，小作坊发展为食品厂，平均日产1300斤，节日达20000斤，中西糕点循环品种97个、糖果品种30多个。每天下午，面包从烤炉里出来，顾客排队购买，一直延续30年，成为武昌街头一景。

随着时代进步，“曹祥泰”不断扩大规模，增加品种，规范包装，提高管理水平。食品生产逐步实现机械作业，1960年开始使用和面机、打蛋机等设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年老店焕发青春，“曹祥泰”迎来最辉煌的历史发展时期，首先在规模上争第一。1980年国家拨付15万元改建，面积扩大到500平方米。1982年面积达3016平方米。1993年又投资300余万元改建装修，同时拆除危房重建，加上购买多处房地产，于2000年3月建成新大楼，面积扩大至近5000平方米，在武汉市同行业名列第一。

2000年根据商店的规模和业绩，更名为“武汉曹祥泰商场”。

2001年10月改制完成，实施领导层持大股、全体职工参股，成立了“武汉曹祥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武汉副食品行业唯一一家用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的老字号企业。

品牌传承

“曹祥泰”坚持诚实经营、周到服务、和气生财，“先买进手，后卖出手”，保证

了商产品的质量；“跌在人前，涨在人后”，赢得了顾客信任；“合法取利，不赚黑心钱”规范了企业的行为。这样的经营理念，催生出来的产品，自然经久不衰，1984年“祥”字糕点注册发展为品牌。

“曹祥泰”建店初期，就开始加工产品，其原料都从产地购进，严把进货关，生产按程序操作。如派人到沔阳沙湖一带采购新鲜鸭蛋，经过挑选后才腌制盐蛋，必须腌两周后才开始发卖。生产京果时，一定要选购最上乘的糯米，二月份就浸泡，经过发酵，直到腊月才用来生产。盐蛋、糕点等成了“曹祥泰”的特产，三镇居民纷纷前来购买。

“曹祥泰”的绿豆糕享有盛名，其特色延续至今。这个传统糕点投料讲究、工艺传统，无任何添加剂。绿豆糕软硬口感的力道，也全在师傅们的手腕间，用力过度会太硬，力道不够容易散，每一块糕都是由师傅们纯手工制作。

在“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计划经济年代，“曹祥泰”仍特别重视产品质量，继承“选材认真、生产规范、做鲜卖鲜”三大传统，厂长经常到食品柜了解糕点营销情况，有时直接上柜营业，倾听消费者意见，不断提高质量。1981年恢复生产精、小、细的传统品种，当年日循环品种80多个、月循环品种150多个。“小双麻”成为湖北省名牌产品之一，其配料、工艺选入商业学校的教材。

从1990年代开始，食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超市以其品种繁多、价格便宜、购买方便，分流了大批顾客。更有各种饼屋比比皆是，“曹祥泰”“做鲜卖鲜”的优势已不明显，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仍顾客盈门、水泄不通。通过市场调查：一是消费者认为只有“曹祥泰”节令糕点风味传统地道，二是节日送礼只有“曹祥泰”节令糕点拿得

出手，三是不少老人吃惯了“曹祥泰”就好这一口，由此不少远道顾客也赶来购买。虽然每年的产量都在“加码”，但每年都估计不足供不应求。

1991年，我率技术人员到广东学习月饼生产技术，第一个改变月饼“皮厚心硬”的状况，促进推动了整个湖北地区月饼生产技术的改良。

一百多年来，“曹祥泰”始终有一种“凡事争第一”的精神，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个百年企业，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员工，造就了一系列优质产品，1989年“祥”字牌可可夹心蛋糕被商业部命名为部优产品，1991年“祥”字牌评为省市著名商标。

为传承和振兴武汉老字号，“曹祥泰”将永不停步，以老字号带产品，以产品壮大老字号。在抓好日常食品生产的同时，重点保证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佳节的节令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占有率，继续赢得消费者的口碑。注重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两头延伸绿豆糕的销售时间，并研制出适合绿豆糕外销的包装，以满足深圳等地消费者的需求。筹备建立一个大型馅料厂，发挥老字号在馅料生产上的优势，为食品行业提供优质馅料。

卢耀武，武汉曹祥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总经理

“老通城”的艰辛创业之路

◇ 曾宪德

【老字号小档案】

“老通城”创始于1929年，是武汉传承近百年的老字号品牌，其特色风味小吃“三鲜豆皮”，享有“豆皮大王”的美誉。1958年，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来老通城品尝三鲜豆皮，并嘱咐“豆皮是湖北的风味，要保持下去。”

“三鲜豆皮”1989年获得商业部颁发的中国饮食行业最高奖“金鼎奖”，2019年获得湖北省商务厅授予的“楚菜名点”荣誉证书。“老通城”2009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评为“优秀老字号企业”，2015年被湖北省商务厅认定为“湖北老字号”。时至今日“老通城”已成为武汉美食的一个文化符号。

百年品牌，老而弥新。2013年“老通

城”发扬汉派饮食文化传统，通过商标产权转让，并入湖北白云边集团旗下，成立了武汉老通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司投资兴建“老通城文化风情街”，地处“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位于黄石路与铭新街交汇处，占地面积10514.57平方米，是一条集旅游观光、文化消费、特色餐饮、酒店接待于一体的文化风情街，目前正在紧张施工中。至此，“老通城”开始在文化餐饮、特色食品、浓香型白酒、商业地产等方向开展多元经营。

未来，“老通城”将不断振兴与发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老字号品牌，将其打造成大武汉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字号，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彰显城市特色。

我祖父曾厚诚，“老通成”（后更名“老通城”）创始人，原是汉阳永安堡九真山松树湾的贫穷雇农，1904年到汉口谋生。

进城后，祖父当过“野扁担”、苦力、茶房，后上轮船当茶房，跑单帮，在上海大

开眼界，还将天官坊“通成酒楼”的价廉物美铭记在心。后落难到苏州，给富户当保镖，认识了我奶奶蒲守道。奶奶用她十多年当“梳头丫鬟”积攒的十元大洋给爷爷当本钱，回汉口“创业”。



21 世纪初的老通城

爷爷从摆地摊、挑小担起家，后到吉庆街租房开“后成汤圆”小店达7年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动乱中被迫停业，到万国跑马场当保镖。在跑马场，他听到湖北省银行在大智路口新建5家三层楼店面招租的消息，邀请老友（“祁万顺”等家）一同前往，自己租下3号，于1929年初开办“通成饮食店”。

眼光独到 冒险抓住商机

“通成”店面30余平方米，员工10余人，除了经营有基础的“干面食”（包子、粽子、汤圆、生煎、锅贴、发糕）和米酒外，还增加了“汤面食”（肉丝面、水饺等），与“祁万顺”比肩竞争。

餐馆要重视顾客，我耳熟的爷爷对店员的口训是：“要舍得把人家吃！”终于建立了价廉物美的口碑。他重视人才，同乡“饼子爷爷”手艺出众，掌柜唐爷爷则是他的重要智囊。

“通成”的“原始资本”中的每一个铜板，都浸透着我奶奶的血汗。唐爷爷赞过：

“办好铺子不光靠好老板，还要个好老板娘！”奶奶有江浙小吃的绝艺，更重要的是她对员工的尊重关怀，有力帮助了爷爷事业的成功。

头两年，资金周转和生意并不理想。外因是英租界收回后，企事业单位大量关门，一般员工食客大减；大智路口也没有形成气候，餐馆消费主要在江汉路以上老华界。内因是帮会敲诈太多，数额可怕，而官、警勒索也猖獗。

据我叔叔曾幼诚回忆，当时利润较多的竟是卖香烟，其次是奶奶承担的万国跑马场小摊，她每天远行数十里，起早贪黑历尽艰辛，还差点被打劫而受伤。

1931年立夏后，大雨下个不停，爷爷敏锐觉察到恐有大灾，果断租下了1到9号的所有楼上（原先各租户做生意只租一楼门面）。几个邻居、包括实力比他强得多的“祁万顺”都很不理解：本来连天雨生意就很难做，还花这么多钱租房子？就因为银行说一签五年租金可打五折？

爷爷眼光独到，倾其所有资金，又靠人缘和信誉连买带赊，把那些楼上堆满了面粉、大米、木柴和煤球，还储存了些豆类和其他辅料，一些香烟。再用几口大缸腌满咸菜。不过他也担心：万一时间一长，粮霉了，烟潮了，可就只剩一身债了。他当着奶奶责怪自己：我是在盼灾吗？莫遭雷打啊！

实际情况比爷爷想的更加可怕。7月中旬，后湖渍水已涨平铁路堤，局部地方水还漫过，汉口完全被洪水包围，地势稍低一点的街道都要涉水行走。物价也和水一样继续上涨，人心越来越惶恐不安，爷爷租了一条木船备用。

8月2日上午，当腐败官僚还公然在牌桌上陶醉时，洪水最先从单洞门如猛兽狂奔冲入汉口。很快一片铁路堤溃决，当天马路上被卷入洪水的达500人之多，爷爷也差点遇险。不少街巷水深已平房檐，就连地势最高的中山路（今中山大道），水深也有一人多。大量房屋倒塌，满街飘着死尸。

以后几天，爷爷带店员划船，参加上街救人义工。后交警开始带来民工搭设高桥，构筑临时行人通道。第三天，市政府才在烟土税捐项下，筹拨出了一笔款项办灾民施粥站。又过了一天，救济委员会终于“紧急”征调民船，装运蔬菜及生活用品到街巷出售（但次数和数量不多，贵得离谱）。

到中甸，除了木划子，主要道路都搭了高架跳板，算是可以维持市内行人交通了。但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粮价上涨数倍且和水位一样还在涨。各店铺基本关门歇业。尽管政府反复呼吁店铺开门，但响应者不多。隔壁的“祁万顺”因备荒不足，经营非常有限，没多久被迫半停业。陆续出现在水上的商家和小贩，其价格让民众叫苦。

爷爷因有充分的储备，便胸有成竹地又租了两条船，在店里四楼平台上大量蒸馒头、花卷，煮好干稀米饭。除在店门口架高台营业外，他还和奶奶分别带上店员划船沿街售卖。他们将食品装在篮子里，用竹竿递给高架桥上的行人和街边二楼窗口的客户。在粮、盐、菜、柴都濒临脱销、面临断炊的汉口，每天卖出对象超过千人。爷爷嘱咐“比市价低三成”出售，但也比平日上涨了几倍，汉口几乎没有几个餐馆能望其项背。

爷爷虽说赚了钱，内心却并不愉快，他对我父辈说：那些饿肚子的灾民，总像在他眼前打转，“该赚时候我们赚，也该回报，老天都看得到的。”吩咐店里每天专备一些

稀饭和馒头，免费救济近处的灾民。还主动到商会义捐。展现了当时商界稀有的东西：良心！

水灾过后，市面很长时间仍不见好转，物价非但没很快回归，还继续上升了一段时间，汉口各业一片萧条，仅熟食小店就有50多家倒闭歇业。而“通成”令人瞩目，本钱和实力大上一个台阶，口碑也赢到了。水退后，爷爷主动上门还借款，有个债主吓了一跳，因为到处都在躲债，误以为是还不起债的人上门要横。

多元发展“蛋光豆皮”问世

“通成”乘势发展，从两个方向优化品种：一是将现有的做精，例如将清炖莲子羹升级成了较高档的小吃。奶奶亲授的苏州官富人家享用的各种稀饭、羹类就多达十多种，深受附近散场后的戏迷、特别是女客的青睐。爷爷为此特地升级了餐具，以不同价位品种招揽不同消费层次顾客，高档的配上了金边细瓷碗。二是馒头包子品种大大增多，其中酱肉大包、锅贴小包、柳叶牛肉包等就有十多种，直到二十世纪末都声名不衰。

爷爷并非总是成功。他一度推出许多具有苏杭风格的甜食，如黄松糕、条豆糕、豆沙泥、鸡蛋发糕等，却因价格相对贵而多数人消费能力低，被接受的仅剩价廉又黄霜诱人的鸡蛋发糕，成为长年保留品种。“豆沙泥”虽好吃，但舍得买的人不多，不能创新亮点，后来便并入了酒菜。

这年中秋，爷爷回永安堡探望灾民父母，被老家传统食品“豆丝”启发，回店后推出清汤、糊汤、干炒豆丝，很受欢迎。

他想到玉贤集一个小摊有“摊好不切”的大张豆丝皮，便也试着做了，撒上葱花给

家人吃。在全家称赞时，我父亲却说：“你的豆皮包过来就破了。我吃过武昌王府口‘杨洪发豆皮’比你这好吃多了。”爷爷得知那是道光年间就有的老店后，就专门过江去“偷经学艺”。后雇了一江夏落难厨师，推出了“蛋光豆皮”。一上市就很为顾客接受，很快被口传为“通成”的特色小吃。

爷爷不停步。有次与友人到三教街“邦可”西餐馆小坐，享受了一杯冰镇红茶水，立刻感悟“洋人太会赚钱了”，这一杯成本比一碗伏汁酒还低，价格却可买十几碗伏汁酒！他注意到，来这里的消费人群，除了洋人和几个穿洋装的，再就是有钱人家女眷，一般市民很少。于是想要对众多的穷人顾客，推出他们消费得起的冷饮产品。

当1932年炎夏到来，“通成”率先推出了冰镇绿豆汤、冰镇伏汁酒，立即博得了被酷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汉口人的青睐，生意“爆满”。而冷饮成本低、制作工艺简单，销量一大，利润比卖传统小吃高出好几倍。

“通成”趁盛夏又推出一款“刨冰赤豆”，既是汉味，成本还低，受欢迎程度竟大大超过前两种，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放学后排队在门口等，刨冰大盆一端出来，立刻一片喊买声，不到半小时就卖光。这成为以后多年的保留小吃。



20世纪90年代老通城一楼大堂

爷爷注重细节，每年提前两月与法租界“和利冰厂”签购冰合同（如果零买，每块重100磅两元钱，要去排队买牌子，再凭牌子等候领冰。签了合同，不但不用排队，还享受1元5角的批发价）。雇了专用板车，买了有防雨保温的棉箱笼运回。

同年，“通成”引进厨师，开始全面推出酒菜，其中来自咸宁的章师傅“瓦罐鸡汤”，成了最受欢迎的招牌菜。市民口传的“四大厨师”——章矮子（瓦罐鸡汤高手）、胡胖子（卤菜）、钟长子（苏菜风格）、姜麻子（苏菜风格），一时生意大旺。

大智旅馆 承担民族责任

为解决扩大经营的流动资金困难，爷爷又果断将租下的5家楼上改成了旅馆，并租下紧挨公新里的一栋三层楼房。他观察到，汉口要么高档旅馆、要么低档大排档，而流动较大的商人和一般中产阶级更需要中档旅馆。便在1934年开办了“大智旅馆”。他说：开旅馆雇人少、钱稳赚，是个“哑巴儿子”。果然大受市场青睐，营业额和利润大增。此后，他又投资参股了“万国旅馆”等多处项目。

当时，家父曾昭正就读于武汉大学。早在大水灾过后，“通成”大门外当街砍下4个“共党”的头，这让曾家看到当局的凶残，爱憎自然形成。“一二·九”运动期间，父亲将“大智旅馆”变成了爱国学生（学联、青年救国团等）的秘密活动场所，亦成为北平南下学生（“北平学生救国会”“民先”等）与武汉学联的接头地点。“大智旅馆”被学生称为“抗日饭店”（详见李锐、刘西尧、郭佩珊有关回忆录）。1937年5月，父亲被蓝衣社驻校机构认定为“共党嫌疑”

开除。而我二姑曾竹恒、中文系才子李行夫（后成我二姑父）当即愤然退学，放弃文凭以示抗议。我读初中的叔叔曾幼诚竟也受牵连，被东湖中学的反动校长用拐杖痛打成重伤后辍学。

爷爷“望子成才”的梦想竹篮打水，曾一度气愤难忍要上珞珈山拼命，被祖母劝住。

父亲被武大开除后没有消沉，以更大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用半年多时间和李行夫合编了《大家唱》。1937年10月，第一集由光未然作序后自费出版发行，数月后第二集由冼星海作序出版，成为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爱国歌曲集。

1937年上海沦陷后，武汉第三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父亲全身心投入爱国歌咏运动，加入地下党组织的“业余歌咏团”。爷爷出于爱国心，让店子里“伤兵吃饭不要钱”，并支援流亡爱国人士，让上海“演剧二队”金山、王莹等数十人在大智旅馆免费住宿，还细心照护近乎残疾的进步文人高士其。在社会上，他低调参加了不少公益活动，博得了很好口碑。

“大智旅馆”和“通成”成了爱国文化人士最集中的地方，曾家也成了冼星海独自办公和创作的场所。父亲和冼星海、光未然等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并积极参加三厅组织的爱国活动，成为“中华全国歌咏协会”领导成员。爷爷出于商人的谨慎，在中山大道与黄石路交界处租下一栋三层小楼开设“分店”，方便父亲与友人交往又不妨碍主店生意。

武汉沦陷前，爷爷将餐馆、旅馆停业，送我叔绕道香港转移到上海我大姑曾颖明处，家人则分路逃离武汉到重庆。

在大后方，爷爷想另辟新路创业，起

初想培养我叔叔做生意，拿出7000大洋捎到上海。没想到，我叔叔在大姑的言传身教下，已决心献身民族的解放事业，二人将钱大部分捐献给了党组织后投奔新四军。

抗战胜利 “老通成” 开张

当爷爷在大后方的生意几乎陷入绝境之时，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他迫不及待通过江湖门路，只身赶回武汉，急望东山再起。

哪知大智路5家门面，已被“平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占用，“大智旅馆”也被炸毁。爷爷无奈联合原租户多次交涉、送礼，最后房屋终于得以继续承租。

爷爷卖掉了华清街的地皮，又借了一笔钱，用“老通成”招牌重开餐馆。他精明选用的这个“老”字，招引得市民蜂拥而至，大家视“老通成”为民族不屈最终胜利的象征，餐馆得以迅速重振。

“老通成”扩充了二、三楼的营业，除原有品种和瓦罐鸡汤等招牌菜外，又陆续聘请小有名气的李、陈二位广东师傅，增设了广东卤菜、嫩肥带血的“柱候油鸡”、香甜适口的“广东文烧”“烤猪膘肉”和伊府面等。此后，又聘请北京陈师傅在夏天精制北方冷饮，如“冰镇酸梅汤”“杏仁豆腐”及“豌豆黄点窝窝”等，老产品“赤豆刨冰”也很热销。

此时，在“飞虎队”担任翻译官的父亲，因反对内战愤然退伍，回家参与经商。他在武汉早有名气，朋友多而广，加之见识开阔，善于利用市场信息，还因懂英语找门路购进了电冰柜，大大方便了生熟食储存。

1947年，“老通成”聘请到名厨高金安师傅，他用鸡蛋、肉丁、虾仁、冬菇作馅

料的“三鲜豆皮”，大受顾客热捧，成为传世至今的“非遗”杰作。父亲又顺势花了近千银元安装了“豆皮大王”和“瓦罐鸡汤”霓虹灯广告，让“豆皮大王”成了公认招牌。

“三鲜豆皮”顿时轰动三镇，“老通成”一反常规，大伏天也继续经营豆皮，“不到老通成，不算到汉口”开始流传。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初，几乎每天有民航人员大包小包买了带去台湾，“老通成”豆皮70多年前就飞越了海峡。

父亲在原大智旅馆地皮上“买天不买地”建了一栋三层楼房，开办“继诚烟号”，利用社会资源主营批发，利润比餐馆高得多，让资金进入良性循环。

不久，爷爷又在对着电报局的中山大道街面，开办了一家两层的“群宴楼”。厅中六张方圆桌，靠墙四张两人对酌小桌，还有一角烟摊。楼上设四小一大包间，卖酒菜办宴席。借着“老通成”的名气，它很快就成为食客盈门的“高档餐馆”。在满街饥民的同时，竟有很多脑满肠肥的官商，带着漂亮时髦的女郎坐满这里，其利润居然高于“老通成”本店。

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10月始，一场史上少有的金融危机爆发，物价飞涨。进入1949年后，常能看到餐桌上的奇特景观：吃东西的人整个头埋在桌上堆成小山的钞票后。“老通成”从早到晚不停改写菜牌价格，甚至一碗面没吃完，价就又涨了。

商人不得通过兰陵路黑市，将不值钱的金元卷换成美元（银元要没收），结果有次老通成的人被警察抓住，一板车钞票（小半天的营业额）被“充公”。3月，当局上门搜查，公开警告爷爷说，知道他有子女是“共党”。爷爷深感处境危险匆忙关店，率家躲到黄石路小巷民宅中。

此时，一支国民党溃军流落到东山里东泉池，居然当街绑架我父亲，讹诈了“继诚烟号”的金条和两大箱“红金”香烟才放了他。

迎来解放 首家“裸捐”国营

武汉解放后，万象更新，生意顺利。加上参加革命的女儿归来，让爷爷感到了人生的满足。在担任江岸区委副书记的女儿曾子平的影响下，1953年去世前，留下“不当资产阶级，将所有财产捐给国家买飞机”的遗言。我父辈们坚决执行，让曾家成了武汉首家主动裸捐的资本家。

“老通成”走向国营，经营更加兴旺。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两次光临惠济路分店，留下“豆皮是湖北风味，要保持下去……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的赞誉，大大提升了知名度。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金日成、西哈努克……都到过“老通成”。而武汉招待外宾时，最后的压轴一定会是“老通成”豆皮。

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老通成”更名为“老通城”。此后，在掌门人张斌的有力经营下，“老通城”的经营规模到达顶峰。1989年，全年营业额达2000多万元，为当年全国餐饮业销售状元，三鲜豆皮也荣获中国饮食行业最高奖“金鼎奖”。

“老通城”，作为一家以美食闻名的餐馆，作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鲜豆皮”诞生地，给大武汉留下了永久的城市记忆。

曾宪德，“老通城”创始人曾厚诚长孙，武汉汽轮发电机厂高级工程师

开栏小语：武汉城市圈以武汉为中心，辐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八个城市，构成荆楚大地最具活力的核心发展区域，担当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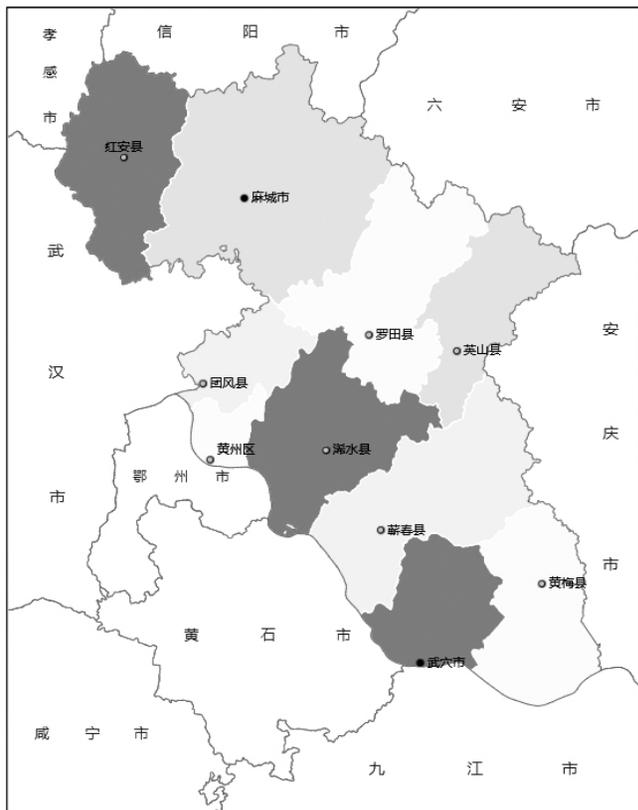
九城一脉，源远流长，曾经同谱灿烂历史文化；九城同心，接续发展，当今共书时代奋进宏图。为凝聚共识，推进融合，发扬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协作的优良传统，《武汉文史资料》与城市圈各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紧密合作，从本期起开设“九城同心”专栏，飘出一条多彩的武汉城市圈文化交流纽带。

年内，专栏拟每期推出一个城市专题，深挖地域文史资源，展现城市人文魅力，交流精神文明成果，推动“九城就是一城”理念不断强化，助力武汉城市圈融合发展。

黄冈历史文化简介

◇ 李青松

湖北省(鄂) - 黄冈市



审图号：GS(2018)2512号

黄冈，古称黄州，湖北直辖地级市，武汉城市圈城市之一。共辖1个市辖区、2个县级市、7个县，总面积174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00万人。黄冈地处吴头楚尾，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在此融汇，形成丰富厚重的黄冈地方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光辉璀璨。黄冈是中共早期建党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诞生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3位中共一大代表，组建了红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4支红军主力，发生了黄麻起义、新四军中原突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渡江战役等重大事件，走出了200多位开国将帅，先后有44万英雄儿女为缔造共和国而英

勇捐躯，铸就了“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老区精神。

名人文化耀眼夺目。黄冈自古以中国杰出人才之乡闻名于世，孕育了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明代医圣李时珍，“京剧鼻祖”余三胜，“黄梅戏宗师”邢绣娘，革命先驱林育英（张浩）、林育南，现代地质力学创始人李四光，爱国诗人闻一多，哲学家熊十力等 1600 多位古今名人。北京中华世纪坛收录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 40 位名人中，黄冈荣膺 3 位，为全国市州之首。

戏曲文化绚丽多彩。黄冈是中国戏曲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五大地方剧种之一黄梅戏的故乡，黄梅戏、楚剧、汉剧和京剧均含有“黄冈元素”，形成“四戏同源”的独特文化景观。黄冈有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湖北黄梅戏、麻城东路花鼓戏和入选省级非遗名录的鄂东楚剧、武穴文曲戏、罗田东腔戏、英山采茶戏。“一去二三里，村村皆有戏”，成为鄂东大地的一道绚丽风景。

禅宗文化久负盛名。黄冈宗教历史悠久，自古就有“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的美誉，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3 位祖师先后在四祖寺、五祖寺建立道场，开山说法，实行定居传教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奠定佛教中国化、大众化、生活化坚实基础，在中国宗教、哲学及艺术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医药文化蔚为大观。黄冈中草药种植、加工历史悠久，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历代著名中医达 244 人。明代蕲春名医李时珍，誉为世界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其倾注毕生精力撰写的《本草纲目》誉为“东方医药巨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北宋浠水

名医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为中医学经典著作，收入《四库全书》。明代罗田名医万密斋著《万密斋医学全书》，是继《千金要方》之后又一部中医学全书。

生态文化别具风情。黄冈依山傍水，是华中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汇“峰、林、潭、泉”于一地，集民俗风情、历史人文于一体，分布着世界上最大、最集中、最古老、最壮丽的杜鹃群落，具有极高的旅游和科普价值。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的黄冈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全长 460 公里，贯穿黄冈 7 县市，连通红色遗迹、绿色生态、禅宗文化三大旅游区，沿途层峦叠翠、雾海流云、鸟语花香，是大自然馈赠给黄冈的宝贵遗产。

东坡文化独领风骚。黄冈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巅峰之地和东坡文化的发祥之地。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 753 篇诗词文赋及行书《黄州寒食帖》，达到艺术创作的巅峰。其构建的黎庶性、思辨性、感悟性、创新性、包容性东坡文化，成为黄冈以至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之一。

根亲文化源远流长。黄冈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移民史，曾发生“楚国灭鲁迁邾”、东汉王朝两次移徙巴人、西晋末年流民南迁侨置、四次江西填湖广、两次湖广填四川等重大事件，在绵延不断的移民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具有孝善、仁爱特色的根亲文化。

李青松，黄冈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

黄冈共存社独立展开建党活动

◇ 董志伟 史智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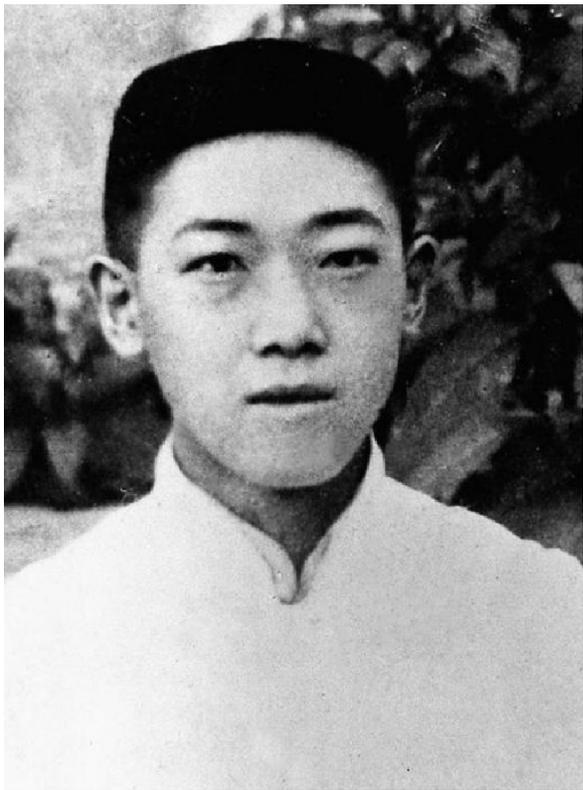
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作“波社”（“波”即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的记载。但对于这段明确载入中共党史的早期建党情况，大多数人不知详情。我们对此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专题史料征集，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以飨读者。

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

1915年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先进分子和有志青年深受鼓舞，率先觉醒，身体力行，涌现出众多以抨击封建专制和文化为己任的进步团体，成长出恽代英等众多青年先驱。

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等武汉青年和学生，共同发起组织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制定了“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等主要戒律。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在长江中下游产生的第一个进步社团，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湖北地区进步青年和学生迅速团聚在它的大旗之下，林育南、肖人鹄等黄冈籍在汉青年纷纷加入。



恽代英

随之不久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进步团体和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互助社的进步青年们从中得到启示，开始“以俄为师”，学习和思考运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改造中国的现实，以实际行动探索救国之路。他们于1918年6月在中华大学开办启智图书室，推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1919年初创办《新声》半月刊，进行新思想新文化启蒙。这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亦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

此后，武昌的部分进步青年以互助社为榜样，纷纷组建觉社、健学会、武昌工学互助团等组织，创办《我们的》《互助》等刊物，探讨社会问题，将湖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推向新阶段。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和学生林育南，是武汉地区学生游行、集会、演讲、动员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

1920年2月，已经在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实验“共同生活”的“互助主义”。受其先进理念和巨大号召力影响，互助社等众多进步组织团体的成员纷纷加入利群书社，使之成为具有广泛联系和较大影响的武汉进步青年联合团体。书社销售《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资本论入门》等著作和《新青年》《少年中国》《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期刊，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武汉进步知识分子接触、交流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又成立利群毛巾厂，以践行其思想理论。

由于利群书社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恽代英、林育南等世界观发生根本性变化。1920年下半年，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恽代英和利群书社社员折服书中崭新的观点，产生巨大的思想冲击。书社社员李书渠曾回忆说：“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这也促进了我们的提高，我们从此书的内容开始明确：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

共存社成立的黄冈背景

如果说互助社、利群书社执湖北武汉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牛耳的话，黄冈的回龙山地区则在鄂东开近现代进步和革命风气之先。

清末民初时期，东乡布业和晒烟是黄冈县的两大优良品牌。回龙山位于东乡中心地域，人口稠密，田地较少，盛产棉花，男耕女织历史悠久。广大农民为求生存，充分

利用盛产棉花优势和纺纱织布特长，农闲时从事布业生产，时人称之为“机户”，棉花纺织特色明显。

同时，回龙山的棉纱供应和布匹销售也很兴旺，村民纷纷走出黄冈，在武汉等地开设货栈、商行，把东乡的棉纱、布匹销售到武汉等地。他们接触外界新生事物，开阔了眼界，更新了思想，普遍有着“实业兴国”“读书兴国”的情怀，因之身体力行经营实业（染织业），支持兴办教育，倾心培育子女读书。

回龙山八斗垮林氏家族，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林育南从小在家读私塾，1915年随父亲居武昌，并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从而结识了恽代英等革命志士。林育英的父亲经营染坊、布业，来往武昌、黄冈之间。林育南、林育英就读于当时的新学堂而结识有识之士，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活动。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二人渐次实现了世界观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在武汉读书的林育南在组织学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以声援北京学生的同时，还将北京、武汉的运动情况写信告诉了在回龙染铺垮从事染织的堂兄林育英，劝林育英“也在乡间干起来”，组织回龙山地区的进步青年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五四”运动。

1919年秋，林育英与林洛浦、胡亮寅等在回龙山八斗垮林氏宗族私塾的基础上，创办濬新小学，向青少年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

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创立共产主义小组后，陈潭秋、陈学渭、胡亮寅、肖人鹄、刘念祖等人，在濬新小学建立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经常在一起研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社会进化史》等革命书籍，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恽代英从林育南等人处得知濬新小学情况后，曾亲赴黄冈县回龙山，对濬新小学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学校的氛围和思想基础良好，可作为革命阵地，实践他“打基础”“行主义”的主张。

1920年底，濬新小学因办学经费枯竭等原因而暂时停办。恽代英对此十分牵挂。1921年1月14日，恽代英约卢斌、林育英商讨重建濬新学校事宜，决定地址、校名及办学方针均不改变。“教育注意实地观察，野外生活，自治互助，乡村实用。尤注意学生的成就，为我们的运动——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有力的生力军”。决心把先进思想传播到乡下去，到民间去，以学校为阵地，培养革命青年。学校的筹办工作比较顺利，恽代英在1921年4月16日给林育英、林洛甫的书信中指出：“濬新状况教（叫）人大为乐观。际盛来信告我一切情形。”

1921年5月上旬，濬新学校在林氏宗祠重新开办。校长为胡亮寅，教员有唐际盛、吴景钟、卢春山、李求实、沈光耀等，学生有五六十人。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学、地理、历史、图画、音乐等科目，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又注意培养学生为“共同生活”服务的能力，开黄冈一代乡风。此后，濬新学校成为利群书社同仁探索改造社会的重要据点。

共存社成立大会经过

1921年暑假，恽代英开完南京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回到武汉，与从北京回来的林育南，以及李书渠、林育英等商量召开互助社

和利群书社年会，决定年会举行地点选在黄冈县回龙山八斗湾濬新学校。

1921年7月中旬，参加会议的人员先后从武汉乘船抵达黄冈团风后，步行来到濬新学校。至7月15日，共有24人到达回龙山八斗湾。其中，恽代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此时来黄冈聘请织布师傅，应邀参加会议。

会议从7月15日至21日持续7天。会议日程安排明确清晰，讨论内容具体丰富。会议将新创建的組織定名为“共存社”，取社会大同、人类共存之意。将共存社的宗旨明确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1921年8月10日的《我们的》期刊对于这次会议的日程和会议议题、每日大会主席等都有明确记载和报道。

会议期间进行过充分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围绕共存社是否成立、共存社名称及主张、宗旨等，讨论和辩论更为激烈。利群书社和共存社成员吴化之在《我们的师表》一文中回忆说：“在会上讨论成立什么

样的组织时，曾考虑过成立类似苏俄共产党的波社，亦即中国的波（布尔什维克）社。这时候大家的思想里对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等也有了些粗浅的认识，也认识到要革命就要准备流血牺牲。……代英综合归纳了与会者的意见，并经过大家一致同意，决定这个组织仍定名为共存社”。

共存社成员廖焕星在《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一文中回忆说：会议“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决议组织共存社。修订社章和通过宣言，明白地号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苏俄，赞成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从共存社的宗旨可以看出，恽代英、林育南等，公开宣布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奋斗纲领基本精神，在本质上是十分接近的。它的成立，标志着恽

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的世界观，发生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

会议讨论了共存社各股委员的职权，社员的表决权及经济和戒约，书社、学校、工厂的经济事项等。会议决定共存社分社员、社友。明确了社员经济关系：有



共存社成立旧址——濬新学校（今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湾村八斗湾）

自由支配的银钱财产“应统捐入”，不能捐入“须向总务股经济干事报账，申明理由”。会议还规定社员必须遵守的戒约：不嫖、不赌、不烟、不酒、不纳妾、不奢侈、不作有害社会事业、不做有害团体以及非不得已不作社会不以为怪之恶事。

1921年8月10日《我们的》总结新成立的共存社“颇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色：（1）组织严密，俨然一国家；（2）分社友社员，使人入社不致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了社务；（3）注重消极修养，又不避免破坏事业；（4）总务股委员用袁氏金匱投票法。总之，我们是人格互信的团体，不作无准备的破坏，亦不作无目的的预备团体。”

共存社成立后的若干活动

因共存社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年代较远等客观原因，对于共存社成立后的工作情况，知之不多不详。现综合各方面所知，简略列举共存社成立后的若干活动。

1. 将杂志名称《我们的》改为《共存》，举办刊物抓宣传工作，介绍宣传共存社成立的过程和纲领主张。

2. 大力发展社友社员。林育英在黄石工矿区，卢斌在四川泸州师范，罗四维在河南荥阳、焦作，卢春山在安徽安庆等地，都做了大量发展社友社员工作。

3. 在继续办好濬新学校的基础上，还在武汉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夜校，大力发展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4. 在1921年9月至12月发生的粤汉铁路、汉口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中，林育南、李书渠等人作为工人运动领导人，较好地组织领导了罢工运动。另外，罗四维在河南焦作领导了焦作煤矿工人罢工。

5. 1921年底，共存社委派林育南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共存社亮相国内外政治舞台。

在共存社成立两天后，即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等人，从各种途径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迅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林育南于1921年8、9月间在中共武汉临时工委成立后，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久，恽代英通过他早已结识的陈独秀，在上海入党。1922年2月，林育南、恽代英又介绍林育英入党，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1922年初，林育南在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认为共存社追求的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一致的，于是与恽代英等商定，共存社自行解散，大部分成员先后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林育英回忆说：“当我从上海回到武汉以后，湘浦（林育南）从远东大会回来，主张取消共存社，自愿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志伟，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黄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史智鹏，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员

黄梅戏“回娘家”四十年

◇ 章华荣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曾名采子、采茶、黄梅腔、花鼓戏、三角戏、二高腔、下河调、三角班、黄梅调等。它起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盛行的采茶歌，即茶山上广泛流行的山歌、畈腔、民歌小调，经过历代艺术家的创造，逐步发展成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的中国五大剧种之一。

1983年，湖北省委主要领导提出“把黄梅戏请回娘家”。经过40年创新发展，湖北黄梅戏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黄梅戏源于黄梅县

黄梅县位于湖北省东部鄂、赣、皖毗邻地区，东与安徽省宿松县为邻，西同湖北省武穴市接壤，北连蕲春县，南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瑞昌县隔江相望。

古代黄梅县的紫云、垅坪、多云等山区盛产茶叶，名紫云茶，每年春茶采摘季节，青年男女上山采茶，以采茶歌、采茶调相互唱和。“沿途耕获爱田家，黄麦青秧胜看花。听得无腔郊外曲，隔江空自怨琵琶”（清人高植《从封郭洲抵小池口》），便是这种场景的生动写照。除采茶歌以外，渔歌、樵歌在黄梅县也非常盛行，明代徐霖记述“老稚相与歌于野，商贾相与歌于途”，清人徐世芳《太白渔歌》诗曰：“苹叶芦花极望长，歌声缭绕水中央，夜来渔火还归棹，惊起沙洲雁几行。”黄梅因而素有“歌乡”美誉。

关于黄梅戏形成的年代，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到元末明初民间戏曲的雏形已经形成。据《鄱阳渔鼓座谈纪要》（赵南元整理）和《景德镇采茶戏简介》（徐荷生整理）记载，明朝万历中期开始，黄梅调即以道情的形式传到江西省鄱阳湖

周围各县。这个记载，可从崇祯年间黄梅知县曾维伦《黄梅风教论》一书中“十月为社戏”的记述得到印证。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黄梅采茶戏形成两小（小生、小旦）、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班社，没有固定的班址，没有固定的人员，只是松散型季节性的业余组织，人员七八个即可。所谓“七忙八不忙”，是当时戏班子流行的一句俗语，就是说班子七个人就忙些，有八个人就不忙了。

到嘉庆年间，由“三小”发展到“三打七唱”。“三打”，即三个人操六件打击乐器；“七唱”，即七个人唱戏，指老生、老旦、正生、正旦、小生、小旦、捞杂（小丑）等七个行当的演员。一个戏班子，只要有这七个演员，就可以演一台大戏。传统剧目、唱腔、舞台表演形式的原始积累已基本形成。那时候，班社林立，名优辈出，其代表人物就是邢绣娘。

黄梅戏“流浪”他乡

那么，黄梅戏又是怎么从黄梅流传到安徽去了呢？

黄梅背山面湖，北面上乡是山区，南部下乡是平原，长江一决口，大半个黄梅县就成了“江行屋上，民泊水中”的“水乡泽国”。据《黄梅县志》记载，自明洪武十年（1377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黄梅县就发生特大自然灾害103次，其中大



关广富与英山县黄梅戏剧团《银锁怨》演员在一起

水灾就达65次。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毁灭性的水灾就达12次。

由于连年水灾，田园、房屋被毁，黄梅下乡的灾民们只得携儿带女，邀伙搭班，以唱黄梅戏糊口谋生。随着灾民流浪的足迹，这些艺人走向远方。

一支自九江流传到皖西南、赣东北、鄂东南的都昌、波阳、浮梁、景德镇等50余县。清道光、咸丰年间，繁昌知县何元炳的七绝《下河调（黄梅腔）》，生动描述了黄梅戏流传到鄱阳湖一带演出的盛况：“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

另一支从宿松和华阳河流向安徽的太湖、怀宁、望江、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庆地区一带。演出的时候，因为起源于湖北黄梅县，所以就叫黄梅调。在演唱过程中，因黄梅土话难听懂，安徽艺人就将道白中的黄梅话改作当地的怀宁话，故安庆一带又把黄梅戏叫作“怀腔”。并由单纯、枯燥的“三打（三个人打六件打击乐器）七唱”，加进了管弦伴奏。同时，还在表演上借鉴了徽剧

艺术表演程式，对黄梅戏的塑身定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3年，安徽省委宣传部长的桂林栖，决定将安庆的黄梅戏迁至合肥，成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有人提出叫怀宁戏，有人主张叫黄梅调或采茶戏，身为黄梅人的桂林栖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去掉黄梅调的‘调’字，去掉采茶戏的‘采茶’二字，两名合为一名，就叫黄梅戏！”他还组织陆洪非、时白林、乔志良为严凤英、王少舫整理改编《天仙配》，并于1955年拍成黄梅戏电影在全国播放。从此，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风靡全国、蜚声海内外。

“把黄梅戏请回老家！”

黄梅戏起源于湖北，发展在安徽。如何学习安徽黄梅戏的经验、继承黄梅采茶戏的精华，借鉴其它剧种的发展优势，在此基础上大胆革新创造，推出新时期具有湖北特色的黄梅戏，成为湖北省主要领导关注的问题。

1983年7月，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在黄梅县龙感湖长江大堤上视察汛情时说：

“既然黄梅是黄梅戏的娘家，我们一定要把黄梅戏请回老家来！”1986年省委常委办公会议正式提出：“湖北是黄梅戏的故乡，要采取得力措施，把黄梅戏请回来。”

为落实将黄梅戏“请回娘家、打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省文化厅和黄冈地委、行署制订十项措施，抓好戏剧创作，打磨出一两台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剧目。

1988年1月，黄冈地区组织两台黄梅戏《银锁怨》《於老四与张二女》赴京演出，这是湖北黄梅戏首次在全国亮相。北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两剧在京演出盛况。王任重、陈丕显、秦基伟、陈慕华等中央领导和在京的黄冈籍老将军陈锡联、陈再道等观看演出，在接见演员时对两台戏进行了高度赞扬。

这次晋京汇报演出的直接成果是：首都和全国观众知道湖北也有黄梅戏，黄梅戏的“娘家”得以正名；兴办黄冈地区艺术学校，培养黄梅戏艺术人才；引进杨俊、张辉等黄梅戏优秀青年演员，成立湖北省黄梅戏剧院。



黄梅戏大剧院

剧院建立以后，拍摄湖北第一部黄梅戏电影《血泪恩仇录》，填补了一项空白；拍摄湖北首部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貂蝉》，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创作上演《双下山》《未了情》。1995年10月，《双下山》《未了情》参加第二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演出，《未了情》获一等奖名列第一，杨俊、张辉获个人表演金奖。《安庆日报》载文：“导演大家手笔，演员戏中有戏，湖北团高潮迭起！”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说：“安庆的街头巷尾、社区居民，人们都在谈论湖北的黄梅戏。他们说，湖北的黄梅戏比安庆的黄梅戏好听，是地地道道的正宗黄梅戏。”

同年11月，《双下山》《未了情》进京汇报演出，这是湖北黄梅戏第二次进京。如果说第一次进京，使北京专家、观众确认了黄梅戏的发源地；那么第二次进京，就使得他们真正领略了湖北黄梅戏与安徽黄梅戏虽是“同本同源的并蒂双莲”，前者却又独具楚风汉韵。

在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林毓熙说：“湖北团带来两台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好戏，是新人新戏、新的思维，有一股青春的气息，一股蓬勃的朝气，给戏曲带来了新的希望！”谈到黄梅戏《双下山》时，林毓熙说：“从编剧手法、导演技巧、演员的表演技能，到戏曲因素的极限调动，都发挥到了极致，堪称戏曲的经典！”因而，该剧被列入中国音像精品工程。

1997年10月，《未了情》作为全国唯一一台黄梅戏参加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文华新剧目奖”第一名，杨俊获“文华表演奖”，余笑予获“文华导演奖”，陈精耕获“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4年11月，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代表

中国，赴乌克兰参加第三届国际艺术节，所演出的黄梅戏，被誉为“中国的乡村歌剧”“东方神奇的艺术”。《乌克兰真理报》载文说：“中国演员一出台，观众就被陶醉、被征服、被迷住。”

此后，湖北黄梅戏相继赴美国、法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波兰等国家和地区演出，真正实现了将黄梅戏“请回娘家、打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

湖北黄梅戏精彩纷呈

新的世纪，湖北黄梅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创作上演了一大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黄梅戏精品剧目，如《娃娃要过河》《东坡》《传灯》《余三胜轶事》《李四光》《槐花谣》《李时珍》《英子》《青铜恋歌》《铁面金光梯》《大别山母亲》等。这些剧



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演出的现代黄梅戏《未了情》

目参加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湖北省地方戏曲会演等，获得无数大奖。

2013年，《娃娃要过河》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文华优秀剧目奖”，主演杨俊获“2013年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这是杨俊第二次获此殊荣。

继《血泪恩仇录》后，又陆续拍摄《英子》《娃娃要过河》《东坡》《传灯》《罗帕记》等五部湖北黄梅戏戏曲电影。同时，湖北黄梅戏还六次赴港、台演出，使湖北黄梅戏传遍神州大地。

戏因人传。剧作的成功与否最终全靠演员在舞台呈现，中国戏曲（包括影视剧）说到底还是演员的艺术。因此，一批新剧目的精彩问世，必然会产生一批优秀演员。如《未了情》《双下山》《娃娃要过河》《李四光》《余三胜轶事》《李时珍》《槐花谣》等剧目，打造了杨俊、张辉、程丞、谢思琴、石蔚华、董小满、王刚、吴利亚等；《於老四与张二女》《奴才大青天》《传灯》《洋务总督》《邢绣娘》《青铜恋歌》等剧目，打造了黄东风、周洪年、郭华阳、徐记柱、王慧君、余文新、邢凌云、卢正杰、王美、黄小勇等；《银锁怨》《折不散的冤家》《天堂梦》《铁面金光梯》打造了郑叔兰、余万能、段秋萍等。同时，也造就了熊文祥、林海波、范国清、陈章华、许晓武、章华荣、陈祖望、湛志龙、夏泽安等一批享有盛誉的知名剧作家、导演和作曲家。

湖北黄梅戏独具特色

“黄梅戏回娘家”经历四十年的艰苦探索，形成了湖北黄梅戏独具的特色。

一是戏剧创作题材领域的开拓。传统的黄梅戏多表现为风花雪月、儿女情长，风格大多偏向含蓄娟秀、缠绵婉约；而湖北黄梅戏则侧重黄冈的历史名人，如李四光、苏东坡、李时珍、余三胜、毕升、陈潭秋等，抒发的是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风格大多偏向气势磅礴、豪放张扬。

二是舞台挑梁行当的转换。湖北黄梅戏的新创剧目中，主角大多以生代旦，如《李四光》中的李四光，《东坡》中的苏轼，《余三胜轶事》中的余三胜，《传灯》中的弘忍、神秀，《铁面金光梯》中的金光梯、和珅，《八斗湾》中的陈潭秋，《青铜恋歌》中的楚王、聂铸等。男性有阳刚之美，“手持铁板唱大江东去”，将黄梅戏的舞台艺术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三是湖北黄梅戏唱腔音乐的传承和创新。黄梅戏源于黄梅县，在请回娘家的过程中，既要学习安徽黄梅戏已取得的成就，又要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湖北黄梅戏。《娃娃要过河》的唱腔音乐将鄂西民歌“龙船调”和黄梅戏有机叠加，形成带有楚风、汉韵的鄂派黄梅戏；《余三胜轶事》中，将鄂东东腔、湖北汉剧和京剧有机地融合到黄梅戏的唱腔音乐中，余三胜从唱东腔到唱汉调、从唱汉调到唱京剧，既有京剧、汉剧的激越高亢，又有黄梅戏的舒展婉转，融合得自然贴切，天衣无缝，被誉为对黄梅戏开拓性的创新发展。

章华荣，曾任黄冈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湖北省黄梅戏剧院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国家一级编剧

围着铜人像转一转

◇ 潘莫元

汉口有座闻名遐迩、妇孺皆知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座落于江汉区六渡桥，人们亲切地称之“铜人像”。六渡桥是历史地名，有名称不见桥梁；铜人像是历史文物，有铜像没设门牌。相同的是六渡桥铜人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汉口繁华街区的泛称。

百十年来，铜人像周边几千店铺住户、数万居民，都以与铜人像为邻做伴为荣光，都以六渡桥繁华兴盛而自豪，但凡亲朋好友询问工作单位或居家地址，准会异口同声作答：铜人像或六渡桥。嘚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汉口人，在铜人像周边老街深巷生活了60年，先后居住过美人前街（今勤劳一巷）、长堤街、民权路等大街小巷，对集稼嘴码头的倚水岸线、片石垫路的逼仄小巷、店家相邻的商市街衢、古香古色的历史建筑、联系乡党的会馆公所、高朋满座的酒肆茶楼，都是那么熟悉、亲切、眷恋和难忘。

铜人像漫话

孙中山铜像立于六渡桥闹市中心，坊间习称“铜人像”，是继武昌阅马场孙中山铜像后，在武汉所立的第二座铜像。

1933年4月下旬，孙中山铜像历经1927年动议兴建、1929年筹建施工、1931铸造运回等环节，最终在民权路、民族路和三民路交界处的“中园”（时称六渡桥磨盘）安置竣工。自此，铜人像便以没有命名的地域名称，享誉武汉三镇。

铜人像坐南朝北，高约5.2米。其中，铜像高2.15米，基座高1.3米，呈四方形，花岗岩砌成。基座上镶白石，刻有汉口特别市市长吴国祯撰写的276字《像赞》和《序》。基座下建麻石台阶5级，麻石出自湖南。

铜像背南面北，免冠着中山服，右手空拳，左手微垂，右腿直立，左腿向前，昂首挺胸，双目远眺，造型庄重，形象传神。



1940年代孙中山铜像

基座正面镌刻“孙中山先生之像”字样。时人称赞，铜像“使国内艺术大放光彩”。

是年6月1日上午9时，吴国祯柬请各界著名人士齐聚三民路口，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典礼。“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四十余年，肇造党国，勋德之隆，亘古无铸。面汉口华洋荟萃，轮轨辐辏。与武昌同为首义之地，称华中重镇，先生昔尝莅临……”揭幕仪式上，吴国祯宣读了《像赞》和《序》。

江汉区文化馆同事万生鼎先生曾与我谈起铜像揭幕时的情景：“那时我才8岁，爸妈牵着我一起去看。会场人山人海，鼓乐齐鸣，还放了很多焰火。随着覆盖的青天白日旗拉下，我才看清铜像的全貌。揭幕后果围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1949年后，因市政道路建设需要，原基座四周的铁栅栏拆除，基座和铜像经修缮，保护完好。

1983年，孙中山铜像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为纪念辛亥武昌首义100周年，江汉区文体局斥资13万元，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加固基座，深刻碑体，铜人像焕然一新。

物换星移几度秋。迄今，孙中山铜像伫立于此已经八十八载矣，每天从先生身边经过的行人、观瞻的游客络绎不绝。还有些儿时在这里嬉戏、现已垂暮的老人，依然喜欢在铜人像歇息，或前思后想，追忆过往岁月；或静坐眺望，看周边车水马龙，沉浸在“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喜悦之中。

太平会馆寻踪

会馆、公所是明清之际经济发展、商业繁盛的产物。商业发达的汉口出现“本地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现象，诸多外来商贾开始按地域结成商帮，如湖南帮、江西帮、安徽帮等，商帮的活动和议事之地称会馆。

铜人像周边是汉口商业中心，聚集有长沙会馆（大董家巷）、江西会馆（万寿巷）、黄州会馆（二圣巷）、福建会馆（福建街）、太平会馆（花布街）等十多处。这些会馆大多宽敞、高大，建有戏台，或有空地能搭台唱戏，是众多会馆中的佼佼者。

民国时期近代社团兴起，商业会馆逐渐衰落，直至全部消失。馆址或改作学校，或拆除，或他用。如江西会馆改为武汉市第七中学，长沙会馆改为长沙巷小学。日前，铜人像一带一息尚存的会馆，仅有太平会馆旧址一处。

2021年1月5日，江汉融媒体中心邀

我探访太平会馆旧址，追寻昔日汉口镇铜人像商肆的繁华。

太平会馆位于花楼街西端即民权路至二盛村段10号，1933年以前称花布街。花布街东与白布街即民生路至民权路段连接，西依黄陂街，千店毗邻，百业兴旺，足见在此地设会馆眼光之独到、精明。

太平会馆始建于1869年，是安徽太平县商人集资所建，起初只是为了聚拢汉口徽商，相互帮扶，后来徽商发展壮大，太平会馆逐渐成为本地徽商的象征。太平天国战后，太平会馆一度被焚，幸而损失不太严重，后来徽商集资重修了正厅。

遗憾的是，有关太平会馆建筑时间、风格、规模、结构等史料记载不多，且缺乏权威论证，存世的实物更是凤毛麟角。好在是遗迹今日尚存，虽然空空荡荡，通过实地观察、探访，也能领略、感触到太平会馆昔日的风貌和气魄。

我们来此探寻时间是花楼街二盛村片旧城改造之后，花楼街只剩下了一半，与太平会馆隔路相对的半条街已经消失，只有孤零零的几栋房子被围挡遮掩着。太平会馆所在的半条街，以及会馆附近房屋，老旧凌乱，大约是在等待拆迁。

20世纪初，徽商逐渐没落，国民政府严令会馆改建，太平会馆顺应潮流，以新生、建华摇袋社和第一网袋社为基础，与复兴、春和、叶茂盛、姚成记、代新记织带厂组成新华织带厂。

1961年，新华织带厂与江汉织带厂合并，生产圆带和扁带。

转瞬几十年过去，新华织带厂停产退出，厂址作为江汉

区商业文化遗迹得以保留，处在城市旧城改造大环境下拆与不拆的纠结之中。

眼前，门框上方新华织带厂5字牌名被红布遮盖，尘封在斑驳的墙头，锈铁大门内一片静寂，除了一个在值班室值守的老门卫以外，再无他人。

我们一行4人扛着摄像器材，进入青石板铺设的通道，由于年代久远，路面有些破损，但仍然显露出昔日风貌，是江汉区唯一尚存的市政古建筑。

青石板路宽约3米，与当时汉口老街老巷相似。穿过青石板路，两间石库门之中，依稀留着几个时代的印记，从太平会馆到新华织带厂，一路风雨波折，又重回那个宁静的小院。

沿着右侧的石梯登上楼顶，俯瞰太平会馆的全貌，依旧能感受到曾经的壮观与兴盛，仿佛满院商贾耸立的围墙外，包裹着的青砖白瓦依旧是旧时的模样，只有砖缝里生出的枝诉说着早已人去楼空的清冷。

拍视频时，一位在二盛村居住80多年的芦光荣老人，与我们交谈，回忆起太平会馆曾经的风光：会馆有高大的石库门，方型石柱，石柱础雕刻有花草草，栩栩如生，非常精致，小孩们都喜欢用手去抚摸。园子



太平会馆旧址新华织带厂

里到处有壁画、浮雕，像戏台一样令人向往。也正是童年的见识，让他渐渐爱上了戏曲，仿佛唱腔中，能让他梦回那个古院，触摸那满园的辉煌。

如今，太平会馆的故事只能萦绕在人们的记忆里，或者在有幸留下的一砖一瓦中去追寻。并由此领悟：一个城市的辉煌和生命，不在于他有多少高楼大厦，老街老巷和一切老事物，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

估衣街忆往

估衣业是服装鞋帽业态之一。传统的估衣业开始以经营旧服装为主，后来也同时经营新货，即成衣店制作的新服装。旧服装主要来源于典当行，多是典当者所典当衣物不能如期赎回，而由典当行变卖处理的“死当”。估衣经营者购回略加整理后，在估衣店（庄）门市销售，赚取差价，若经营得当，利润可观。

20世纪30年代，汉口估衣业初由黄陂帮在黄陂街经营，约10余户。后逐渐转移至民权路、三民路一带，鼎盛时多达数十家。有意思的是，民权路的估衣庄集中在路南，三民路的估衣庄集中在路西，以铜人像磨盘为交接点，成“<”型向两边展开。而民权路路北和三民路路东的估衣铺面却很稀少，这就是经营场上的“扎堆效应”吧？

民权路、三民路估衣街规模较大、店堂较讲究、经营较得法的估衣庄有汉广发、华兴永、华丰永、天成、王益太、鸿章、鸿成永、信大、陶德记等十余家。

其中，鸿章估衣庄为笔者姑父所开，位于民权路统一街口，铺面不是太大，但生意活络，收益丰厚，透过他，也许能窥探到估衣行当的一些经营门道。

鸿章估衣庄老板姓江，黄陂人，圆圆带笑的脸庞，说话和气、幽默，身材壮实，1946年携家带口来汉经营估衣。

估衣庄楼高三层，一楼经营，二、三楼为小作坊和住家。三楼顶外墙写有“鸿章”两个斗大楷书，远看十分醒目。一楼店堂约80平方米，后墙处装有一排玻璃门货柜，货柜前安放木质柜台，与货柜并齐，货柜与柜台之间铺木质走道。店堂大门及柜台上方装有横竿、钩子，挂着毛皮、呢绒、绸缎的长袍、大衣、旗袍、马褂等旧衣服，其中以皮货居多。

江老板有一双利眼和一张巧嘴，到典当行打货时，既识货又会砍价，一番口舌下来，总能背上一包称心如意的衣服回来。销售时，江老板善于察颜观色，洞悉买主心理，投其所好，热情推销。

江老板练就了一门旧衣洗烫整理、翻新改旧的本事。譬如，皮袍、皮袄的毛色发灰、毛皮发紧，他就将膏粉均匀地洒在皮毛上，再用细竹条仔细抽打，手法娴熟，力度恰当，几个回合后，提起皮衣，抖去余粉，毛皮立显光亮、蓬松、柔软。

江老板从事估衣行当20余年，生意做得活泛，获利颇丰，全家8口人衣食无忧，位列小康，在同业中有一定的名气。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着衣式样变化和新货挤占市场份额，估衣业逐渐没落。1960年代，鸿章估衣庄关门歇业，江老板到一所学校当了门卫，直至退休。

潘奠元，江汉区文化馆原馆长

汉口老里份“东山里”题刻初探

◇ 胡全志

东山里题刻要素齐全不可多得

2021年10月7日，我随人文武汉志愿者团队，到江汉区绍兴片区待拆迁的一些里巷寻访历史建筑。在任冬社区前进二巷附近，发现一栋两层骑楼腰部嵌有一块花岗岩石刻，远看有“东山里”楷书双勾阴刻三个大字，端庄有力。仔细辨认，似乎有落款，值得考究。为弄清此石刻的年代与题书者，10月9日我又专程去找相关社区干部咨询，并借来长梯近距离拍摄了“东山里”题刻照片。

这块题匾为花岗岩石材，外立面长124厘米，宽46厘米，突出墙面约2厘米。“东山里”三字从右至左横书，右首上款隐约有“民国十八年”三字，竖书，“十”字略有漫漶，略似“廿”；左边落款能辨认出的是“□治金□书”，竖书。下款下方隐约可见上下排列的二枚4厘米见方的铃章，精工镌刻但线条极细难以辨认。

骑楼上住有人家，窗口正在题刻上方，曾将空调外机装在此处，遮住了“东山里”三字。现场观察，整块石刻字迹大部分清晰，除钉有8颗膨胀螺栓外，保存基本完好，并安装有简易防盗栅栏。由于表面曾被涂料遮盖，个别字迹一时难以辨认，但通过专业人员清洗、拓印，其字即可全部显现。据历史地图标注，我市民国时期共建有200多处里份，大部分里份没有题名，少数有的往往只有里份名而没有建造年代和题书者姓名，而东山里题款书法、款识要素俱全，实为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具文物价值，应予以保护利用。

汉口两处东山里仅存其一

汉口有两处东山里，一处属江岸区，原在中山大道大智路与黄石路之间，经拆迁改造已成“历史”。这一处据《武汉地名志》（武汉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第1版）“前进一里”词条介绍：“1924年由谢毓标建

房成里，称东山里，名由不详。1967年改名光荣里，1972年东山村并入，改名前进一里。”

现场发现，前进一里今已改名前进二巷。《武汉地名志》载此处“东山里”资料源自何处，难以查考。东山里有可能是1924年所建，那么东山里匾额则有可能是1929年（民国十八年）所刻，从字形上看，更有可能是1939年（民国廿八年）。武汉市原貌保留下来的里份匾额极少，在拆迁中，很多被毁坏或失落。如2005年华清街口圆拱门刻有“华清街”三字，为珍贵文物构件，被拆时石刻断裂，后下落不明。

由于绍兴片区已实施拆迁改造，东山里珍贵题刻尚未列为文物，我于10月20日撰写《关于民国遗存东山里花岗岩题额石刻保护的建议》，通过城市留言板向江汉区政府提出建议，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东山里口骑楼及题刻外观

一、实施当前保护。

一是将东山里石刻视同文物对待，列入保护名录，实施临时保护措施，防止损毁、破坏。

二是在拆迁施工前，安排专业文保人员进行传拓，存留书法真迹为后期研究、出版史料所用。

三是展开石刻题款图文建档，如有条件，可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完整的测量数据，考证研究，确定其年代、作者，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文物价值论证及申报。

四是在拆除时注意保护其形态完好无损，包括上面的膨胀螺栓，不随意处置，以防破裂。

二、计划后期利用。

东山里石刻若初步评定为文物，区政府按相关规定进行文物收藏保护，如区博物馆暂不具备收藏、保护条件，可移交市博物馆保存、展陈。若不符合文物评定标准，也可作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利用。

一是与绍兴片区拆迁开发单位联系就地保护，在该片区道路、建筑规划设计中，保留东山里地名，并在路口设计一座传统风格的地标牌坊，将石刻嵌入牌坊上方，作为当地里巷地标和街景，让居民由此守望乡愁。

二是在不宜独立修建牌坊的情况下，考虑在小区新建小游园或绿化区时，将匾额以及从附近收集的墙脚碑、地界碑、石门框、石柱、礅墩等石质建筑构件，精心设计为有历史建筑文化氛围的街头景观，有望成为网红打卡点。这类石刻，在未来建设历史建筑主题文化公园时，还有可能发挥其重要作用。

10月27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回复：“我局接到转办单后，高度重视，于10月22日指导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召开相关历史文



东山里题刻近观

化遗存专家咨询会，形成对包括该题刻在内的前进二里、绍兴里、富源里等历史遗存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意见，并要求区文旅局向区政府报告，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东山里”题刻何人所书尚待破解

11月17日，长江日报记者梁爽从留言板上看到东山里题刻保护建议后，邀约我一起去现场探访。

19日上午，我和梁爽见骑楼开着窗，里面住有人，于是走访这家住户，了解东山里历史情况。住户是68岁的郭腊珍及儿子、儿媳一家。她说：“这是我公公、婆婆的房子，我是1979年结婚搬过来的，后来经过了改建，一直住到现在。”至于房子的历史，她也不甚知晓。

在骑楼旁的前进二巷9号门口，遇到土生土长的64岁老居民张静，他热情地带我们到东山里转了一圈，一一介绍这是1号、2号、4号、7号。他讲道：“听家里老人说，原来住在这附近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处骑楼还曾经是国民党的指挥部，后来还被日本人占领过。”此前，我也曾听街坊说，这里住过一位国民党的师长，与张静的说法相吻合。张静说，20世纪80年代这栋楼曾经改建，由于骑楼很坚固拆不动，便保存了下来，后期有过加盖。

既然又来到现场，为不虚此行，我和梁爽商量去绍兴社区借长梯，对题刻进行细致考察，以弄清题书者姓氏和印章。社区党委书记肖平表示，已接到上级通

知，目前东山里房子暂缓拆除，究竟是否保留，还要进一步论证，即使决定拆除，这方题刻我们也会完整保存起来，放在街道里。

借来梯子后，我再次爬到4米多高的题刻前，分别用手机对匾文、上款、下款拍了多张照片，可惜，由于带有铁刺的栅栏所阻，手机无法贴近题刻文字细部，即使在表面喷洒了清水，通过照片仍无法辨清其落款首字和钤章篆刻。

下款“冶金”，显然是书法者名字或字号，而“冶”字前面的姓却因笔画略有残缺，模糊莫辨。“书”字前面也有一字，一般常用“敬、贺、拜、谨、嘱”等字，从字形上看，“谨”字可能性稍大。

由于东山里拆迁的复杂性，其论证过程的漫长及结果的不确定，加上石刻上的文字尚未一一考证清楚，梁爽的采访报道计划随之搁浅。我们共同期待，这方石刻未来能发挥它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

胡全志，现任武汉市政府布衣参事

拧紧人生发条，干出青年政协委员的样子

◇ 王涛（口述） 王欣然（整理）

人物名片：王涛，市政协委员，湖北省青联委员，湖北楚商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楚商联合会副秘书长、楚商智库创始人。

2021年11月27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冬天的下午天黑得早，室外寒风呼啸。

市委统战部知工处陈莱处长带着同事，赶到省农博会临时办公室分别与七八位同事一对一谈话，对我续任第十四届市政协委员进行资格审核。和5年前的情形一样，在经过十多个部门的考察之后，我有幸踏上新的履职征程。

从十堰市郧西县“金鸣三省”的大山深处，走到大江大湖大武汉；从一个曾经户口都没有的外来青年，到为1300多万人口参政代言的大家庭中的一员；从“武汉市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到优秀政协委员。青春的烈焰，因政协的舞台而燃。

清晰地记得，2017年2月16日，《湖北日报》以“武汉两会上的‘80后’委员”为题报道了我和董明、杜帆等“80后”委员。文中这样写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委员的头衔是信任，更是责任，因此提建议不在于数量多少，更关键在于它的含金量及可操作性。

这是我当时的心声，也是我履职的承诺。作为共青团和青联界别的委员，我深知，自己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全武汉市的青年，代表的是未来的中坚力量，肩上扛的是数百万武汉青年的热切期盼。因此，在上一个履职的五年岁月，时刻有一个声音在我心头萦绕：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与托付，绝不能丢武汉青年人的脸。

正如那篇文章末尾的记者观察所言：这是“两会”上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属于“80后”，仅从数量上看，他们在代表委员中所

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80后”的加入，让他们每年春天都有了一段共同的履职印记，也让这个履行职责和参政议政的舞台有了青年的锐气，流淌着一股清流。

经历也好、谈论也罢，不管能不能亲历“两会”，中国的年轻人正在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它。他们渴望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也愿意埋头苦干从小事做起，为城市发展和社会变革贡献力量和态度。

如果对我过去五年的履职打上一个绳结，这个结上可以写上：这五年，是步履匆匆的五年、成长最快的五年，也是生命旅程中值得永远铭记的五年。

做一只“蜜蜂”，认真履职，积极建言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优质的“蜂蜜”源自不知疲倦地辛勤采撷。

由于我担任的社会职务多，社会活动和调研考察特别多，日程表经常记得密密麻麻，但无论什么时候，政协活动始终排在第一位。2021年5月，政协组织到贵州和广州调研。15日在武汉，16日单位通知要到延安学习，学习完后当晚即从延安赶到西安，17日凌晨4点赶早班机由西安飞贵阳……类似于这样马不停蹄，打“飞的”一天跨越几个省市的事情时而有之，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多忙都不能落下政协组织的学习和活动。其实我知道并不是完全不可以请假，但在我看来态度决定一切。



做客《政协论坛》探讨武汉“世界设计之都”建设

五年来，初略统计下，先后参加了政协组织的培训学习和考察20余次，提交提案建议16篇，市内调研、座谈50余次，外地调研5次，撰写调研报告6篇，政协常委会发言3次，参加《政协论坛》节目录播6次，各类媒体采访30余次，参加电视问政4次，市直机关民主评议活动6次。只要是政协通知的会议或者活动，我几乎没有一次缺席。

只问耕耘的执念，驱动我认真对待政协的每一件事，也因为真心付出了，赢得了更多支持与关注。在连续5年两会期间，我接受了凤凰网、人民政协报、中国网、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卫视和武汉电视台的采访，为青年代言发声。参与主笔《长江新城产业定位和规划建议》并代表经济委员会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被《长江日报》报道；参与主笔的《湖北自贸区跨境电商调研报告》由提案委员会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发言；参与主笔《引进人工智能领域高端人才来汉就业创业》，并代表青联界别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发言，参与的《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与保

护建议》得到团市委的高度关注，并被《长江日报》特别报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提出的《关于进一步释放产能、缓解防护用品市场短缺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医药抗疫主导作用，切实提高中医药诊疗参与度的建议》《务必警惕：两类湖北人可能“无工可复”》等建议案得到省防疫指挥部、中央统战部认可批示，其中《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医药抗疫主导作用，切实提高中医药诊疗参与度的建议》被中央统战部五局呈送国务院办公厅。

虽然离自己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希望能做到像《大江大河》编剧唐尧形容宋运辉的那样：他不是天才，但能日拱一卒，看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也许每一天的进步没有很大，但永远在前进，永无止境。他是能拿勺子挖穿地球的人。

做一块“海绵”，勤学修身，锤炼自我

学习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在知识更新迭代迅速、瞬息万变的时代，高效履职的前提是让自己成为“专家”，而政协正是一个专家云集的大课堂。

2021年4月25日至29日，市政协组织到浙江大学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专题培训班学习暨浙江人工智能调研。出乎意料的是，27日一早接到单位临时通知，28日在武汉有个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跟市政协领导请完假，27日下午上完课后，匆忙从浙江返回武汉，到武汉已经是夜里11点多。28日上午参加完活动，第一时间奔赴机场，打“飞的”赶赴浙江大学下午的学习和调研。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

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在政协学习的每一个小时，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五年来，我始终将自己当作挤干的海绵，随时随地汲取知识的给养，开会记笔记、开车听广播、睡前看书成为一种“行为自觉”。

这五年，先后参加培训班10余个，各类学习和讲座不下50次，认真研读了政协全会和各种会议上发放的政协统战理论知识读本60余本，中央、省市重要会议文件资料，各类政协提案范本、政府调研文章、研究报告。整理的各类政协书籍资料装满4个书柜，重达180多公斤。每年武汉市十余个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我都会认真研读，并尽量做到每读必细，做记号、划重点、做笔记成为“标准动作”。

这块海绵充实了自己，也擦亮了更多地方。2017年，我主导撰写的《新经济新动能——关于我省青年创业者成长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获蒋超良、王晓东、黄楚平等省领导批示：“调查报告很好，所提建议值得重视。”另外还有多篇调研报告获得湖北省和武汉市优秀社科成果奖。

受工商联、团委、地市政府和院校等单位邀请，十分荣幸地为民营企业、青年创业者和大学生授课12次，分享传播统战理论和创新创业知识，举一反三，锤炼自我。

做一头“黄牛”，立足本职，率先垂范

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在我看来，做一个好委员的前提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单位和社会有贡献的人，其中至少有三个标准：

一是要求员工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好。这些年来无论晚上工作到多晚，坚持每天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7点半前到办公室。遇到难事急事，不推脱不计较，首先冲在前面。2021年有幸成为市政协委员工作室的试点，每天看到挂在办公室的委员工作室牌匾，就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2019年赴咸宁参加问道楚商500强活动

二是专业领域精益求精。近五年，立足本职工作，我带领编辑同仁先后高质量编辑出版《楚商》《荆楚浙商》《黄冈楚商》等期刊近百期，积极讲好“湖北故事”“楚商故事”，主导参与《湖北省青年创业者发展状况调查》《湖北省促进就业专项调研》《湖北省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武汉市人民防空规划大纲（2016—2030年）》《咸宁民营经济调研报告》《楚商发展报告》等20余项课题，其中两个调研报告得到蒋超良和王晓东等省领导的亲笔批示。此外，天南地北访楚商，行走万里。先后参与组织楚商大会、“亲清”政商对话、地市招商对接等活动38场，其中“亲清”政商对话得到了蒋超良、陈一新等多位省领导的亲笔批示和相关厅局的高度认同，成为全国政商关系的“湖北样本”，荣获全国工商联“创新中国”优秀案例奖。

三是积极投身参与社会公益。对比大企业，我没有一掷千金的底气，但成人达己、经世济民一直是我人生的信条。近年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恩施抗洪、十堰爆炸事件、郑州和随县水灾中，自己带头并依托楚商平台积极号召组织企业家捐赠。疫情期间志愿服务50多天，

参与组织楚商募捐合计17.12亿元，所在的楚商联合会成为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唯一一家商协会组织。先后参与省青联、团市委等单位组织的南湖禧乐儿童康复中心自闭症儿童帮扶和对口扶贫等捐助活动。定向捐助十堰市郧西县两位留守儿童，对口捐助西藏中学的一位藏族学生已经考上中国石油大学。每当面对一张张笑脸，都激发出向上向善的无穷力量。

回顾在政协的五年风雨征程，有幸与这么多高人为伍，智者同行，成长很快，收获满满。由于太忙，在社情民意和政协提案数量和质量方面还有很多遗憾，出彩的地方还不够，办事的效能还有待提高。

未来的岁月里，将以政协为荣，为政协增光，进一步勤学苦练，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与水平，拧紧人生的发条，努力干出青年政协委员的样子，展现大武汉青年人的担当和作为。

相信，予我长袖，我必善舞。

王欣然，楚商智库数据情报中心实习生

黄鹤振羽，古城新貌背后的政协力量

◇ 亢德芝

人物名片：亢德芝，市人大代表、武昌区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社员、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工程硕士、正高职高级工程师。

我出生于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可以说是与改革开放共成长，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记得上大学时看到的武汉，到处都是城中村、棚户区、低矮的建筑，道路两边都是公共电话亭。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这曾经是体现一个城市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仿佛一夜之间，手机迅速普及，电话亭退出城市的舞台。而如今的武汉，早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万分有幸，我成了武汉这座城市的设计者、规划者，还加入了民主党派，入选为武昌区政协委员，一种深沉而迫切的责任感

攫夺了我的全部心神。这些年来，我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风雨兼程，深入一线调研，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以执着忘我、精益求精的精神，围绕生态文明与历史保护的主体，带着对武汉未来更加美好的期望，持续推动建言献策落地开花。

治一方碧水，美一城风景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之称，有“大江大湖大武汉”之说，水优势是武汉决胜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大自然对武昌十分厚爱，其拥江抱湖、依山傍水，沙湖、紫阳湖等8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点缀其间，水域面积占行政区划总面积的43.7%，是全市水域面积最大、占比最高的中心城区。而武昌，既“优”于水，也“忧”于水。一面是水秀江清，百湖荡漾；另一面却面临水环境恶化问题。

“执尺为其规，握笔划其向。”蔽人之短，汇众之长，凝之精神，聚其智慧，这是我一以贯之的工作态度。从2015年开始，我结合本职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全面深入地开展水环境调查研究，围绕“四水共治”“大湖+”“滨水名城”“东湖绿心”等主题，形成多篇高质量的集体提案及社情民意多向发力推动市、区政协关注采纳。

“四水共治”(防洪水、排渍水、治污水、保供水)是2017年武昌区政协的一项招标课题。1月,《实施“四水共治”,推进生态武昌建设的对策研究》成功被区政协列入专题协商计划。我作为课题组组长,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按照“保障水环境、凸显水格局、优化水网络、利用水空间”的总体思路,推进武昌生态文明建设。武昌率先谋划“四水共治”,打造“四水共治”试验区示范区,我在市政协全会上介绍了经验做法。

2018年1月,在“治水”的成果基础上,为实现“活水”,九三学社武昌工委联合区民建共同提出集体提案《关于运用“大湖+”思维,加快湖泊功能区规划建设的建议》,并被区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确定为一号建议案,区委书记领衔督办。为了确实推动一号建议案的落地实施,我们在工作机制上进行了创新,形成一份《“大湖+”实施项目清单》报区政协,区政协与区委区政府通过协商的方式,最终达成共识:完成湖泊景观的规划编制工作,推动1—2个湖泊实施,并形成了《区政协一号建议案办理项目清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何实现政协工作虚功实做?用项目化手段推进工作,把履职“规划图”变成了“施工图”,人人有责任、层层抓落实,各方的主动性明显增强。

为了将一号建议案充分落地不走样,

我本人也参与到议案的办理中来,双岗共同发力,实现充分融合,极大提高了办理的效果。区政协、各界别、各党派以及委员等按照协商建议书进行监督实施,极大推动了建言的落地。

五年来变化十分显著,武昌湖泊水质均有提升,其中紫阳湖和内沙湖的水质由四类水提高到三类水,湖泊周边的公共空间也得到大幅提升。其中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紫阳湖公园,焕然一新,恢复了紫阳湖原古典人文园林的风貌,形成了“一池三山九景”景观格局,更加有韵味,有文化内涵了,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承千年文脉，助古城复兴

武昌古城拥有1800年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是全市4大旧城风貌区之一,内含



昙华林人文小镇

1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昙华林片）、2个历史地段（农讲所片、首义片）。武昌古城是武汉三镇历史最悠久、非物质文化最丰富、物质文化最名胜、空间形态最完整的风貌区。近十年来，我围绕“武昌古城”保护建言献策，推动武昌古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绣花”功夫采取“三微”模式推动武昌古城规划建设。

我多次前往昙华林、粮道街、翟雅阁、得胜桥等古城内部重点区域和中华路城市阳台、长江沿岸等古城周边热点区域调研，掌握了古城最新发展的大量一手资料，奠定了课题研究坚实基础；并前往滨江文化管委会、建委、文旅公司、街道、文体局等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古城相关工作情况；与当地居民、利益相关者、游客、投资者等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大家的建议，为古城保护建设提供思路。

同时充分利用专业平台，广泛听取多方意见。2018年5月，联合联合国人居署主办了武昌古城专家研讨会，同年6月，结合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城市设

计学部2018年学术年会”，邀请国内外专家为古城的保护与建设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在《长江日报》进行了宣传报道。

2018年中标《关于加快推进武昌古城保护建设，凸显“历史之城”综合魅力的对策研究》的招投标课题研究。2019年，提出打造武昌古城亮点区片，形成《关于构建“景区+街区+社区”发展模式，持续推进武昌古城建设的建议》，被选为一号建议案。2020年撰写《关于串联特色街区，链接魅力古城的建议》，被选为二号建议案。

2021年3月4日，九三学社武昌区工委课题组参加武昌区政协专题协商会，就构建“景区+街区+社区”发展模式开展协商，区委副书记、区长余松、区政协主席林军参加会议，课题的有关建议被区委、区政府采纳，并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令人欣慰的是，建言的实效显著，高效推动了历史街区的保护建设。武昌古城保护采取市区联动模式，按照“整体规划+重点实施”工作思路。在整体规划指导下确定重点实施项目，通过各个项目的分期分类

推进，以点带线，连线成片，有序推动武昌古城亮点片区建设。例如通过建言推动区委区政府开展“武胜门遗址”从文物挖掘，到制定保护政策，到遗址公园的建设。

昙华林片实现保留建筑占80%，保护修缮9处历史建筑，降低现有住宅建筑高度，修复山城小镇空间景观，引入当代艺术中心、文物修复体验馆等文化项目，打造昙华林人



2019年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刘江东、马新强和亢德芝（从左至右）在代表团驻地交谈

文小镇。2020年，昙华林片核心区一、二期保护工程全面开街营业，并成功入选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得胜桥千年古轴项目，实现重塑东西城壕—得胜桥老街“一纵一横”的传统格局，保护修复1.2公里的得胜桥老街，改造利用80%的现状建筑，重点修缮武胜门遗址、经心书院、名人故居等历史遗存，再现“一轴千年、昌盛市井”繁华盛景。

规划城市绿道，打造东湖绿心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发展理念变化很大，以前追求的是城市建设的速度，现在则强调的是城市生活的品质。城市绿道建设是优化城市生态格局、打造“湿地花城”的重要载体。从项目的提出，绿道的选线，景观设计到后期的实施，我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参与了东湖绿道建设的全过程。此后，更是持续在东湖生态建设上建言发力，让东湖成为人民心所向往的城市绿心，成为千万武汉人家门口的诗意栖居地。

负责绿道的规划后，我走遍了东湖的每一个角落，曾踩着泥巴走入连动物都难以进入的地方，也曾惊叹野趣横生的自然美景如此之近。如何呈现一条与众不同的绿道？是以生态自然为要，还是以满足游客基本需求为首要？是因地制宜适当降低标准，还是追求高标准的建设为要？我多次问诊专家，问诊市民，问诊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以“不留遗憾”为原则，反复调整规划设计，以求相对完美。在规划实施后，我也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绿道，反思设计中的不足，总结经验与教训。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东湖绿道获准入选联合国人居署“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

示范项目”后，2016年10月，在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我代表东湖绿道设计团队做主题演讲，向世界推介东湖绿道。2016年12月，东湖绿道惊艳亮相；2017年12月，绿道二期的建设完成。至此，百余公里绿道建成，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与称赞。

继东湖绿道将东湖推向世界后，我持续围绕“如何更加全面地保护与提升东湖绿心”建言献策，助推实现“东湖世界级城市生态绿心”的建设目标。2018年开展《武汉市东湖城市生态绿心生态发展探索实践的调研报告》工作，总结经验，查找问题，为东湖绿心的发展精准建言献策。2018—2021年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东湖东进战略，进一步提升东湖绿心生态品牌价值的建议》《关于打造“环东湖生态科创群”的建议》等数篇提案，致力于推动武汉东湖不仅成为城市绿心，更成为新时代城市生态典范和“大美江城”的闪亮名片。

近五年来，我始终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双岗建功，不断调整建言形式，持续发力，最终实现了建言落地开花。实现了党派建言，政府不仅有人听，还派人积极办，并且办理得有成效，作为委员的我有极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同时，区政协在整个过程，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以及参政议政的主体责任，形成了很好的工作机制，也极大地撬动了各党派、界别以及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热情，现代化大武汉的建设，未来可期！

奔跑者的足迹

◇ 杨须红

人物名片：杨须红，武汉市温州商会名誉会长，武汉长兴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民盟成员，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担任武汉市第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

每个人出生后都像一张白纸，无从选择，但如何过好这一生却是个人的抉择。面对生活的磨炼，我选择快速奔跑，一路向前。

起步：当“倒爷”攒下第一桶金

1982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下，我的老家温州乐清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温州人多地少，大家受了市场经济的触动，都往全国各地跑。22岁的我也离开老家，怀揣着300元踏上开往武汉的火车。一页挂靠单位出具的介绍信、一本产品目录与价格表、一张地图，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

来到武汉后，我跟着前辈从事电器贸易，说得直白些，就是当“倒爷”——从温州进货，在武汉出手。这种买卖方式不仅有效解决了需求单位的产品问题，而且让我在推销过程中有了自己掌控的利益差价。就这样，我快速地攒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利用这“第一桶金”，我跟几个朋友在汉口利济路开了家门市部，左邻右舍也都是温州人，甚至同姓，大家抱团发展。模式仍然是从温州进货，在武汉出手。

某天，门店里来了一位客户，订购5000多元的电器配件，我们约定4天内交货。不巧跟我们常年打交道的温州乐清电器厂家没有现货，因时间紧迫，我不得不换了一家不太熟悉的工厂。结果这批配件因质量低劣，烧坏了客户三台电机。我赔偿了客户损失，并上门道歉使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件事也让我深刻意识到产品质量对商家的重要性，我必须生产自己的产品。

跨越：曲折中创“长兴”品牌

彼时，历经市场的大浪淘沙，温州作坊式企业逐渐向大型工厂过渡转型，特别是1991年前后，德力西、正泰等一批品牌企业纷纷崛起。这些外力更加驱动了我体内的“不安分”因子，我愈发意识到“杂牌”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品牌化才是新的发展方向，“办实业，而且要办出自己的品牌！”

说干就干，1992年，我放弃当时已经富足安逸的生活，在汉口唐家墩办厂制造接触器、断路器等电器元器件。当时的我斗志昂扬，自信只要努力去干，一定能干出大名堂。然而，真正去践行创建品牌这条路，我才意识到“制造业”和“搞贸易”完全是两个概念，从研发、生产、销售到服务，多达几十个环节，稍有差错，则全盘皆输。

创立品牌之初我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没想到现实比我想象的还要残酷，直到给我重重一击。历经五年时间研发生产出来的产品迟迟打不开销路，眼看倾注心血打造的产品静静“躺”在库房里，我心急如焚。因为正泰、德力西等企业生产的电器产品已逐步形成完整产业链，批量大、价格低，很快垄断了市场，同质化产品的正面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此外，在武汉设厂生产采购成本偏高，加上“长兴”是个全新品牌，接纳的人很少。一夜之间，我从原来的百万身价变得身无分文。雪上加霜的是，公司员工见此纷纷跳槽，公司如同被剥离了血肉，毫无生气。

我不断反思和总结，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产品定位不准，输在我有人有，产品不具备竞争力，价格也没有

优势。但我仍旧笃定做品牌的初衷没有错，家人也由最初的不理解，到全力支持我这种“扳命”精神。之后，我将工厂搬到东西湖吴家山台商投资区孵化器，决心从头再来。但再次创业，资金问题却像拦路虎一样挡在我面前，几乎不抽烟的我，第一次专为自己买了一盒烟，香烟一根根地点燃，烟雾围绕着我，犹如我当时的人生处境。

“我要100万元，2年后还本付息。”1998年的一个深夜，经过几天的反复思量，我拨通贷款人的电话，不再有半点纠结，语气坚定。“上高端产品”，是我拿到100万元后的第一想法。相比之下，当时还有另一条比较轻易的翻身之路：在武汉市场上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固定式低压柜，起步低、风险小，还能解决公司的燃眉之急，一举三得。很多朋友都劝我走这条路，但我想要的不是翻身，而是站起来，把自己的品牌做起来，哪怕这条路面临披荆斩棘。我将目标瞄准国内高端产品，做高低压成套设备，虽然起步难，但市场相对空白，力争成为领跑者。



参加产品鉴定会的杨须红

天助自助者！终于迎来了好消息，我得知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院和西安高压研究所等专业科研机构里有一批高端储备产品，通过技术转让，长兴电器获得了一批市场上相对先进的产品。不久之后，长兴电器第一代抽出式低压开关柜和中置式高压开关柜问世，被成功运用于武汉体育中心等市政重点项目。市场上取得的逐步认可让“长兴”品牌由“非主流”转为了“主流”。

随着业务不断壮大，长兴集团应运而生，且集团下有三家子公司被评定为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从生产核心元器件到高、低压配电设备，到为客户提供整体供电解决方案，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大批重点项目也都陆续成为长兴的标杆力作，成为湖北的知名品牌。

奔跑：抢占国内直流领域发展先机

品牌做大后，主抓质量的同时，创新就成了企业必须突破的新命题。“创新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我们公司从来不只

是贴墙上的一句口号，而是刻入企业发展的基因。创新是顺应时代的浪潮，有了做品牌遭遇的挫折和反思，及集团走上正轨后资金的保障，这次创新之路更加平稳。当然中间也经历了很多险阻，但经过集团科研团队成百上千次的试验，一起探讨技术的难题，终于技术得以攻关。

2009年前后，国内轻轨、地铁建设生根发芽，各大中型城市都将修建轨道交通纳入规划。凭借多年积累，我意识到，作为轨道交通运行的重要电力保障设备——直流牵引配电系统，未来将会呈现出井喷式增长需求，且在冶金、煤炭、矿山等行业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尽管将研发成果市场化并非易事，但我们始终将眼光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没有丝毫松懈。最终，长兴突破直流核心元器件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直流牵引供电系列产品，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同类先进水平，并通过国家级试验和技术鉴定评审，填补了国内轨道交通直流牵引自主创新技术的空白。

我公司为武汉地铁四号线二期提供的直流牵引设备于2014年12月28日正式运营，系国内首次全线成功应用全国产化直流开关设备，堪称我国直流牵引供电技术发展历程的一座里程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这样评价这一重大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直流牵引供电系统目前在武汉地铁成功投入使用，至此，我国成为世界少数掌握该系统核心技



杨须红向来访人员介绍公司产品

术的国家之一，地铁供电系统全部实现中国制造。”

在成功推进直流牵引供电技术国产化并投入市场运行后，我不敢懈怠，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深入开展科技创新，将城市有轨电车供用电技术纳入新课题。长兴研制出“牵引整流箱式变电站”和“超级电容有轨电车充电装置”，成为当时全国三家能够提供全系列解决有轨电车供电系统整体方案的企业之一。

2015年，这两种产品成功服务华中地区首条有轨电车“大汉阳地区现代有轨电车试验线工程”项目。这意味着长兴气不仅有可能会为现代有轨电车建设提供产品及服务，更将推动现代有轨电车的国产设备大规模应用。

加速：从制造转型到智造

也许在员工眼中，我是一个工作狂人，因为跟我聊天聊不到一两分钟，我必定会跳转到电气行业和项目上去。很多时候家人抱怨我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尤其是每次为我整理出差行李时，特别犯难，因为我是忙碌的“空中飞人”，上个星期在广州、前天在呼和浩特，今天飞云南，后天又到贵州，衬衣、冬装不停切换。

从最初在武汉站稳脚跟的小小梦想，到树立品牌，创建集团公司；从最初只做倒买倒卖的小商人，变成今天的企业家；从配电行业的门外汉，到行业里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这些年我在不停地奔跑，梦想也变



长兴电器成立初期的办公会现场

得越来越大。在公司里有句戏言：长兴集团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杨须红扳命史”。

经过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后，很多人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那段时间，我被隔离关在武汉的家里，不能出差，但并未停止对企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经营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特别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必须让信息化技术融入到企业管理平台、产品制造和创新研发等各领域，实现长兴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变。

我经常感叹时间不够用，没有时间好好陪家人。但看到一群志同道合的长兴人跟随在百年长兴这条路上一起奔跑时，我又感到无比的幸福。

《周易·系辞上传》：“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人只要勇敢走出第一步，不断追求进步，则“大业”会来，盛德也可期。我相信，紧跟时代奔跑的人，定会在人生长河里留下璀璨的星光。

大健康产业的逐梦者

◇ 李德兰（口述） 严 濂（整理）

人物名片：李德兰，武汉宜昌商会副会长、豪爵康养集团董事长、宜昌民建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系宜昌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2013年，获得全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最美洗脚妹”刘丽，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习总书记对全国“洗脚妹”群体的关爱让我备受鼓舞，我也一直把刘丽当作我的榜样。行业无贵贱，劳动最光荣，平凡的伟大就是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

走出三峡，深耕武汉，立足湖北，走向全国，带领姐妹们，逐梦大健康。这是我选择的道路，因为大健康产业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需求，保持着朝阳产业的态势，我对它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从打工妹到董事长

我出生在湖北宜城长山脚下—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那个年代，吃上香喷喷的

大米饭都是奢望，能走到今天，我由衷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同事们不离不弃。我常和身边的人说要懂得“感恩”，更要落实到行动上。

受家庭条件所限，十几岁的我就踏上了艰辛的打工之路，背井离乡给别人家当保姆。后来辗转到深圳，在—家电线厂上班。我留意到工人们戴的手套质量差，价钱也不低，就和—家手套厂取得了联系。物美价廉的手套得到了厂领导的认可，将手套的供应权交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

那时电线厂附近有—家盲人按摩店，闲暇之余，我也常跟着盲人师傅学习按摩推拿。跟他们交往久了，我常想，—个盲人通过坚强的毅力和按摩的手艺，—个月能挣七八千块，我也—定可以。

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人老脚先衰，经常足疗会促进人体血脉流通，调理脏腑，平衡阴阳，疏通经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我认定这是一条走得通的“大健康”道路。

思路决定出路，我下定决心创业。1997年，我盘算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又找朋友们借了几十万，开了第一家盲人按摩中心。这在当时的宜昌算是开了先河，尽管规模很小，但生意不错。那时基本上所有的事情我都要亲力亲为，有时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累得都有放弃的念头。但是看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员工和身后的债务，我又只能咬牙坚持下来。

2003年我决定扩大经营规模，做专业的足疗，打造健康足疗养生文化品牌。没有现成的模式，我就到北上广去考察。中国自古有“豪杰”之说，德千人者谓之豪。2004年初，我在宜昌市西陵区樵湖岭创办了宜昌第一家专业足疗城——豪爵足道。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豪爵 HAOJUE”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拥有员工3000多人，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才200余人，累计为3万余名员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妹”，成长为现在豪爵康养集团的董事长，我走过很多的路，吃过很多的苦。因此，我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也更能体会公司里这群“打工妹”的不易。她们多数来自贫困家庭，有的甚至没上过学。为了帮她们一把，公司在招聘员工时，从来不要求学历，也没有年龄、性别限制，只要能吃苦就行。我会尽我所能，带着她们走得更远，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从自卑到自信

无论别人怎样看我们，我们要坚持走正道，一定要为这个行业正名，树起一支行业的标杆。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也告诫我

们的员工。只有树立了对行业的自信，才能让我们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员更稳固，更有凝聚力。

在十多年前，一提到足疗保健，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一份不太体面的工作。有技师上了一个月的班，洗了几百双脚，回家休息时满脑子呈现出各式各样的脚。她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家人听，家人们不仅没有安慰她，反而群起而攻之。家人对她鄙视的态度，让她大哭一场。尽管如此，她还是和我站在了一起。所以，公司更应支持她，给她以归属感。

为了改变大家对行业的偏见，我带着大家去看餐饮业是怎样服务的，如何端盘子，如何引路，如何行欢迎礼。嫁接人家的服务方式，完善豪爵的服务体系，把服务这个关键词用到极致。

姚远兰是我们豪爵的一名特殊女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谢家坪村人，从小生活在深山，人很勤劳善良，身世却让人揪心。四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被锯掉了左手。后来她结婚生子，随着孩子长大，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听人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她便来到了宜昌。2011年，经人介绍她来到豪爵当服务员，因为只有一只手，店经理就安排她切水果。她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所以十分珍惜，做事特别认真。如今，她切的水果花样翻新，深得顾客好评。她对我说，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会更加的用心。我深受感动，姚远兰靠一只手和一颗认真做事的心撑起了一个“小家”，我也只有更加“用心”，才能撑起豪爵这个“大家庭”。

人无贵贱之别，只有心态之分。我们的企业老板与员工在一起，常以“家人”相称。很多员工都说，他们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在豪爵曾发生一起“中层干部反对涨工资”的风波。2014年豪爵保持利润持平有余，我认为这是中层管理者和员工奋力拼搏的结果，决定按每人每月增加工资。可没想到我刚说出这个打算，就引起了中层管理者的反对。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给钱都不想要的团队实在是太难得了！

在我的倡导下，公司每年都会给困难职工发放资助金。为了让“爱”传播下去，我将“播撒阳光，呵护健康”的企业宗旨化成机制，规定每个季度各门店都要组织员工到当地福利院，为老人、儿童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送健康服务，并为此开发了一套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的积分制系统，鼓励员工行善举。如主动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做一次义工、帮助同事都可以加分；但在家里争吵、损伤公物等则要扣分。所有积分可以累计，一个月一个季度可以评比获得小奖励，一年甚至多年累积的分数也可以参加总评获得意外惊喜。譬如员工达到5万积分，可获一家三口国内游奖励；10万积分，一家三口免费境外游；15万积分，可获2万元车贴……

员工是公司的主体，也是主力。对员工实行积分制能激发内在动力，调动员工内在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强团队凝聚力，为企业留下更多的人才。

我们还引入了线上销售的新业态。利用抖音、天猫、美团等线上平台，

扩大我们的产品销售渠道。据统计，线上销售的额度已经占我们销售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新业态带来的新面貌，无疑会给我们的行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目前豪爵门店总数突破36家，从业人员90%都是进城的“打工妹”。这群来自农村的姐妹们，在豪爵学到了技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很多员工从贫困走向小康，不少员工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有的走上公司管理岗位。

从自卑到自信，豪爵人的尊严就是靠他们自己用行动挣回来的。

从小爱到大爱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相信，“小爱”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就会变得“无穷大”。

每逢节假日，豪爵的员工都会自发组队去养老院开展免费培训、按摩、足疗、清洗和捐献活动。他们细心试水温，耐心帮老人洗脚、掏耳、剪指甲、清理足茧，一边为老人按摩，一边和他们聊天，了解老人们的



李德兰和员工们在一起

生活所需、起居情况和健康状况……每次得知豪爵志愿者要来，养老院的老人们总是像孩子般开心，有的甚至搬出小板凳坐在楼道间翘首以盼。这些回馈和认同“猝不及防”，也让豪爵志愿者们心生感动，多了满足。

守法守信是我的行为准则，因此豪爵从不会拖欠员工工资。当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时，也需要为员工持续提供广阔的平台。于是我创办了员工培训学校，对员工进行免费培训。我们引入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积极推进企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使企业成为员工依靠的家、宾客温馨的家、大众羡慕的家。我要求公司内部着力打造“家”的文化，坚持推动员工个人素养的提升，坚持四项基本员工活动：员工春游、员工春晚、演讲比赛、军事拓展。这些活动不仅让员工在工作之余得以放松，更为员工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凝聚力。

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断将健康阳光的正能量向全社会传播。从“同心共建、携手同行”到恩施“生态移民班”，从参加民建“5·20”慈善义捐到参加精准扶贫，从捐款捐物到身体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也多次捐款，帮助困难学生、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参与民建团体和社会各界的义捐活动。

在民建参与开展精准扶贫调研工作中，我参与“一帮一”的扶贫对象在夷陵区三斗坪镇柏果淌村。两老都七十多岁了，家境贫困，虽然有一个儿子，但在河南当了上门女婿，不再顾家。为了帮助老人，我买了猪、羊和魔芋苗送去，帮着翻新了房屋，现在又在帮助解决饮用水的问题。有了水，待猪和羊都长大了，变现了，两老的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在老两口心里，我就像“亲闺女”一样。

作为宜昌商会的副会长，我积极资助邓村的3名贫困学生。如今，我资助的3名贫困生，一个已继续深造读研，最小的也在读高中。每年寒暑假，我就带3人到武汉参加社会实践或者实习。我会资助他们读完大学，让他们都能自食其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作为宜昌市政协委员，我也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组织的活动，注重走访基层，围绕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难点、热点问题，认真思考、撰写文字材料，提出攸关民生的意见建议，提交提案，积极反映社情民意。五年中，共撰写提案22篇、社情民意19篇，其中有多件提案由市政府领导签批督办，如《关于引入社会资本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助力”建议》《关于在西陵区发展大道富澳家私十字路口安装红绿灯的建议》《关于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建议》等。

“小爱”有力，“大爱”无声，我将自己心中的“善”付诸实践，履行着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我相信，简单事情重复做，就是不简单。平凡事情坚持做，就是不平凡。

豪爵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八个字：播撒阳光，呵护健康。我们的经营理念是阳光的，员工是阳光的，店铺是阳光的，所以才走得这么远。我要让我的每一个员工因为在豪爵上班，变得更阳光、更自信。我将用我的余生，带领豪爵人一起，逐梦大健康。

武钢 1 号高炉的使命与光荣

◇ 钟 钢

1958年9月13日，武钢1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举国欢腾，标志着武钢顺利投产、共和国第一个钢都诞生，载入中国冶金工业和武汉发展的史册。

生在红钢城，对钢铁耳濡目染，当然对武钢1号高炉不陌生。从少年时看1959年出版的《武钢建设史话》的图片，到作为“钢二代”的武钢工人报记者多次登炉采访，再到2019年10月中旬摸着栏杆上的余温向她退役致敬，1号高炉——武钢之根已融化在血液之中。

最近，1号高炉双喜临门，一是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录；二是遗址公园基本建成即将开放，橙、黄、绿、银多种色彩将高炉连同附属的厂房、3座胖火箭似的加热炉，装扮成一只金凤凰。

新春伊始，我又一次走近她，在寒风中仰望，眼含泪光，为她的焕然一新存照。我想我这是被一种精神所打动，那应该是永存的艰苦奋斗精神。

“只争朝夕”大会战

1955年1月，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民“只争朝夕搞建设”那一股劲头的感染，在武钢厂址敲定8个月不到，便绘出了初步设计蓝图：第一期工程年产钢150万吨，成品钢材110万吨；主要建设4座焦炉、4台烧结机、2座高炉（容积分别为1386m³和1436m³）、2座250t和4座500t平炉，还有初轧机、大型轧机和中厚板轧机各一台。

一年之后，青山厂区工程动工，此前矿山已开建。一时间，扬子江畔，青山脚下，各路大军汇聚，有建筑工人、成千上万的农

民、从鞍钢和太钢等老厂选派来的老工人和骨干、解放军公路二师成建制转业的名官兵。10万建设者喊出“天当房，地当床，雨天当晴天，一天顶两天”的口号，在武汉的东郊荒野展开了建设武钢大会战。

1957年7月1日，武钢1号高炉建设开工。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寿荣，任炼铁厂筹备组组长。

1957年7月27日，1号高炉开始浇筑基础。1700m³混凝土必须在30个小时内浇筑不能间断。苏联专家计算后说：“每小时浇灌70m³才能保证质量，如达不到，就得炸掉重做。”（曹葆铭《高炉工地一夜》《武钢建设史话》195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针对这一难题，6月初，总指挥部拿出解决方案。当时，武汉钢铁建设公司只有一座混凝土搅拌厂，即使算上另一座即将完工的小搅拌站，每小时也供应不了70m³混凝土。经过武钢党委研究，决定再建一座临时搅拌站，干部、工人苦战半月终于建成。

7月27日16:00，总指挥部下达浇灌命令，翻斗汽车插着标志“紧急”的“杏黄旗”，从三个搅拌站，摆开长龙一路低吼向1号高炉工地驰来。

车轮滚滚，机声隆隆，翻斗车将混凝土倒进基坑四周的受料槽，由皮带运输机送到覆盖巨大基坑的各个平台，近百名工人推着“小翻斗”一路小跑转运，混凝土倒进漏斗，灌进基础，工人们在坑内握着震动器一层层捣固。

这是一场拼意志、争速度、保质量的立体施工作业，环环相扣。从搅拌、装车、卸车到浇灌，2000多人拧成一股绳，浇灌速度从每小时40m³、50m³逐渐加快到60m³、70m³，最后高达86m³。

28日19:00，震动器振捣结束，现场一片欢腾，27小时浇灌完1号高炉基础的纪录诞生了。苏联专家竖起大拇指：中国工人兄弟真了不起。

1958年4月7日，高炉炉体进入最后一道施工即高炉砌砖，由武汉钢铁建设公司筑炉公司承接。第一战是炉底抹灰，要求次日早晨8点钟以前抹完。工人们分工协作，连续奋战16小时于当日23:00完工。

紧接着高炉砌砖。1号高炉炉底砌筑直径11.4m，炉缸直径8.2m，炉底用高铝砖和大型炭砖交错砌筑，砌一层要用数百块。砖，大的重500kg，小的也有150kg。砌一块砖需要铁葫芦吊，砌上6、7层砖要用千斤顶调整，垂直砖缝不超过1mm，水平砖缝不超过1.5mm，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筑炉



毛泽东主席见证第一炉铁水出炉

工人砌筑炉底第一层花了4天17个小时，第二层，花了5天多。工人们心急火燎，这哪能保证按计划完成。工人徐玉池急中生智总结创造了“顺序砌砖法”，就是把砖预先摆好，控制砖缝，然后顺时针和逆时针砌筑，直到对接合拢。推广新方法，最快时2小时50分钟砌筑一层。

一天，周传典副厂长和张寿荣来到炉内检查，发现炉底已经砌好的第5层砖中，有一块砖角上出现了大拇指般的洞，坚决要扒掉这层重砌，工人们不肯，怕耽误宝贵的时间，拟用同质材料填补。

张寿荣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如果空洞蚀穿，铁水就会钻入炉底的冷却水中，整座高炉将会成为一颗巨型炸弹，后果不堪设想。官司一直打到武钢总经理李一清那里。他听了双方的理由后，果断决定扒掉重砌。”（《张寿荣院士自传——钢铁人生》2021年人民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

此后，筑炉工人的质量意识更强了，砌筑速度稳而快，经过62天鏖战，整座高炉砌砖提前8天完成，验收为优等。

毛泽东来到高炉前

1号高炉原计划1959年初投产，经过三次“提速”，最后定格在1958年9月13日。第一次，1958年初，国家部委要求当年底之前。第二次，武钢根据冶金部指示，提出1958年10月1日。第三次，湖北省委根据武钢党委汇报的情况决定1958年9月13日。

1958年9月3日，1号高炉工程竣工，4日凌晨输进热风烘炉。

9月12日，炼铁厂作最后一次总动员，落实次日出铁各项工作。李一清等公司领导和炼铁厂负责人、苏联专家一次次来到1号

高炉前后，检查铁矿石、石灰石和焦炭等原料准备以及出铁沟、铁水罐迎接第一炉铁水的保障情况。

开炉点火要用大约1400根废枕木，指挥部要求4小时炉内装完。12日23:30，劳模、炉前负责人李凤恩组织往炉内装枕木，“六名老工人各率领一个青年工人分别从高炉的风口和出铁口爬进炉内。炉内烘炉余温在50摄氏度以上，热得工人们头昏脑胀，汗如雨下。在炉外的工人从3号、11号风口和铁渣口，把枕木一根根向炉内递送。扛、搬、递、架，一片火热的劳动场面，有的工人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就干脆光着膀子干。因为都是从铁道上拆卸的旧枕木，上面有许多钉子，有的工人的身上、手上、脚上，都被划破了，现场的护士为他们敷药、包扎，他们都不愿意，从没有一个工人叫过痛。时间就是铁，我们赢得时间，就取得了胜利。”（李凤恩《毛主席看见咱们一号高炉第一次出铁》《武钢建设史话》）这些枕木最终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架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点火。李一清带领有关人员做最后检查，发现炉壁有一处风眼，如不消除会影响出铁，一时想不出好办法。一位老工人找来一根钢管对准风眼四周焊上，再在钢管上安装一个阀门，风眼就被堵住了。对这位老工人的绝招，李一清称赞说，这样的同志要记在武钢的史册上。消除了隐患，谢健厂长向李一清报告说：“可以点火了。”

“李一清激动地握紧一支火把，伸进了1号高炉的铁口，顿时火焰腾腾，热浪滚滚，1号高炉的炉膛燃烧起来。作为开炉指挥长，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虽然有苏联的援助，但是这仍然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建造的最大最新的高炉，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张寿荣院士自传——钢铁人生》）

9月13日15:00,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治中、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钢党委第一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副经理兼总工程师韩宁夫等人的陪同下,来到1号高炉前。他从高炉铁梯健步登上炉台,14位为武钢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先进模范人物在那里迎候。随后,毛泽东上到炉前工休息室平屋顶,这里是看出铁的好地方,已摆上了几把藤椅和许多板凳。为了安全,在平台边沿用竹子交叉扎成护栏,并沿着护栏摆上一溜花盆。

毛泽东招呼先进人物们坐下来,周围的人热情地向他介绍高炉的概况。毛泽东微笑着,询问什么是斜桥、称量车。李一清回答之后,还补充说,这些主要设备,如称量车、主卷扬操纵盘都是苏联提供的。

15:20,李凤恩、包秀良、苏恒秀等先进生产者在炉前坚守岗位,各司其职。接到出铁的指令,包秀良和苏恒秀操纵着最新式的电动开口机打开出铁口,一团红光闪现,照得炉台大放光彩。李凤恩站在二道出铁弯沟边,兴奋地欢呼:“毛主席,铁水流出来了!”

这时,铁水涌出铁口,在铁沟里奔流。毛泽东高兴地站起来,望着火花飞溅的铁水,愉快地同张治中边交谈边指点,炉台上一片欢腾。毛泽东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



1958年9月13日,武钢1号高炉出铁

先向台上忙碌的炉前工们鼓掌祝贺,然后,贴近护栏,朝出铁场周边的职工挥手致意,不时望着炉口。第一炉铁水量不多,大约20多吨。铁水很快就断流了,火光慢慢暗下来。

2020年底,张寿荣对作者回忆说:“毛泽东缓步走下平台,站在出铁场上看还有无铁水。他对陪同人员说:‘再多一点就好了。’厂长谢健赶上来,有些自责地解释道:‘毛主席,第一炉铁水温度好,很顺,但确实是少了一点。’毛泽东听了反而安慰说:‘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毛主席当时观看出铁的情景和讲话,有一些是谢厂长当天晚些时候向我传达的。当时我忙自己的工作,注意力集中在不能出问题。”

毛泽东看完出铁，来到高炉操作室，接见苏联专家。1号高炉顺利出铁，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道贺：建起这么大的高炉，这是你们的巨大胜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1号高炉出铁标志着武钢顺利投产。1958年9月13日，作为重要日子载入中国钢铁史册。武钢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钢铁基地，提前建成了1号高炉，举国欢腾。从此，新中国的第一个钢都诞生了。

9月1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贺武钢出铁》，称武钢1号高炉出铁，“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1号高炉由苏联列宁格勒黑色冶金设计院设计，苏联专家组组长巴杜洛夫负责。当时，1号高炉的生产规模和技术在国际上属于领先水平，有效容积为 1386 m^3 ，有效高度（高炉大钟下降位置的下缘到出铁口中心线间的高度）为 26.7 m ，算上外部的上料斜桥、各种管道、煤气放散阀平台等钢结构，

高约有 70 m 。1号高炉产铁一天2070吨，一年75万吨。比当时“西欧最大高炉”的英国威尔思公司4号高炉日均产量还高500余吨。

武钢的建设发展，炼铁厂1号高炉的生产，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1958年9月13日之后到年底，莅临1号高炉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按时间先后排序）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小平、贺龙。1号高炉建成之前，李富春、陈云视察了工地。”（《武钢炼铁厂大事记》《武钢炼铁五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冠军炉”奉献六十一年

1号高炉顺利出铁，炼铁厂干部职工欢鼓舞，但是他们在高兴之余，没有忘记眼睛向内找差距。厂里组织技术人员、工人骨干一边做好“9·13”之后的生产，一边总结开炉及后续一段时间的得失。这种严谨的作风，求实的精神，在63年之后的今天仍然难能可贵，闪耀生辉。

技术人员奚兆元还撰写了论文《1号高炉开炉总结》：“开炉半个月以来，14天之内共发生了一般事故21次，其中由于基建施工设备质量不好造成的事故为7次，由于设计不合理共为4次，操作失当共6次，验收后管道清扫不干净3次，原因不明的事故1次。”



武钢1号高炉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名录

从9月13日至9月20日发生事故19次，9月20日至9月26日发生2次，9月20日前平均每天发生事故2.8次，而以后平均每天发生事故0.3次。9月20日以后在操作或设备方面事故都逐渐减少，直至没有。在开炉后14天内没有重大事故，基本上未影响高炉生产，基本可以得出结论，1号高炉开炉是成功的顺利的。”（《纪念武钢投产60年技术论文集》2018年冶金工业出版社）

炼铁厂分门别类对事故做了分析和解剖，让技术人员和工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供以后借鉴，避免事故重复发生。

时日如飞，20年匆匆。1978年10月16日，武钢1号高炉停炉大修。按日历时间计算，高炉一代大修周期超过20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影响和“文革”中的减产、停产，3次中修，高炉生产时间为18年1个月（1号高炉设计的一代炉龄为10年）。一代产铁量为943万吨，每立方米容积产铁6804吨。1号高炉属于当时国内一代大修炉龄最长的大型高炉。

与此同时，张寿荣负责成立了一个高炉长寿问题研究小组。从1号高炉大修开始，以后各高炉大、中修时都做炉体破损调查，根据结果来开发适合武钢实际的高炉长寿技术。当时冶金部对此大力支持，武钢也取得了高炉长寿技术的丰硕成果，并运用到1号高炉后来的大修中。

1978年12月16日，1号高炉第一次大修后点火开炉，直到1999年5月13日停炉，高炉大修周期20年。去掉中修停炉，1号高炉第二代生产时间为18年8个月，产铁1546.36万吨，每立方米容积产铁11157吨。这一代炉龄的平均月产量比上代的要高许多。

2001年5月19日，1号高炉第二次大

修后投产，高炉有效容积由1386 m³扩大为2200 m³，炉缸直径也由8.2 m增至10.7m。大修中，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是我国首座采用铜冷却壁薄炉衬结构的大型高炉；上料系统采用PW（卢森堡PW公司）式无料钟炉顶；水冷系统采用串联软水密闭循环系统；炉前渣铁处理系统采用环保型INBA（英巴炉渣处理法）、摆动流嘴和鱼雷罐；热风炉系统采用掺烧转炉煤气和霍戈文高温陶瓷燃烧器。投产半个月，日利用系数即达到了2.0 t/(m³·d)以上，实现了大修高炉快速开炉达产。1号高炉年产生铁量从75万吨增长到169万多吨。

2019年10月14日，1号高炉完成历史使命，光荣退役。她在大修后连续生产了18年，曾经获中国钢铁协会“冠军炉”荣誉称号，成为全国同类型高炉炉役后期特护阶段安全生产、低耗长寿典范。

61年炉火熊熊，热力四射，1号高炉累计生产生铁5426.16万吨，为国家和武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座武钢炉龄最长、被誉为武钢的“魂”和“根”的“光荣炉”作为工业遗址保留下来，又焕发出新的热和光。

钟钢，原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工会副主席

东湖风景区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 童汉芳

我自 1971 年 9 月到东湖风景区工作，转眼已 50 多年过去，从基层工人到管理局机关干部，耳闻目睹了东湖的巨大变化。

从 1949 年武汉解放伊始，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东湖风景区建设，仅制订和修编东湖总体规划就多达 7 次。我有幸参加过第 5 次和第 6 次修编会议，至今还保存着《武汉东湖风景名胜总体规划》（1993 年版）。

东湖风景区建设历经三个黄金时期，即 1950 年代起建设听涛、珞洪、华林景区时期，1980 年代起建设磨山、马鞍山、落雁景区时期，进入新世纪建设东湖绿道和白马景区时期，树立起各自发展的显著标记。

确定世界级风景区

新中国成立后，东湖回到人民手中，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提上了中南军政委员

会领导的议事日程。不久，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 88 号通令，明确了东湖风景区的名称和功能，规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湖沼统



海光农園的老牌坊

归国有，并由东湖建设委员会统一管理。

东湖建设委员会成员多达29人，规格颇高，由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张执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武汉市市长吴德峰、中南财经委副主任李一清和轻工业部副部长周苍柏等组成，阵容十分强大，拉开了东湖规划、建设的序幕。

陶铸在东湖湖滨一栋小楼办公，88号通令从这儿发出，因此后来有了“陶铸楼”之称。在这栋小楼里，陶铸运筹帷幄，领导东湖建设委员会规划东湖风景区的宏伟蓝图，推动大规模规划与建设东湖的第一个高潮期到来。

这次规划的重要价值和贡献，是突破一般性东湖公园的局限，开辟以自然风光为主的东湖风景区，大手笔定位为世界级风景区，远远超越了1950年代的眼光。由此，风景区面积扩展至全湖区域，分为华林、听涛、落雁、洪山、珞珈、龙泉、磨山、清河八大景区，主要景点初具规模，奠定了现有风景区的基本格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湖风景区和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重大项目一样，纳入了新武汉的建设计划，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建设。

东湖建设委员会下设东湖建设管理处，负责日常工作。经张执一推荐，1941年参加革命的万流一（时任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担任东湖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后任处长。1954年3月，万流一请朱德同志为东湖题



1950年代初的东湖风光牌坊



1950年代的东湖听涛景区

词：“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东湖有很好的自然条件，配合工业建设，一定可以建成为劳动人民十分爱好和优美的文化区和风景区。”

此时值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东湖周边除了武汉大学、海光农圃和中正亭（即湖光阁）外，湖山荒芜，一片破败，根本不成景观，人们称之为“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沿湖劳动人民只有极少数破船和茅草棚，有的连茅草棚也没有，一年四季栖身破船，生活十分贫苦，更鲜有游人到此。

海光农圃由武汉著名银行家、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周苍柏1931年创办，种了点水稻、梨树，原为私家园林，不对公众开放。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苍柏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将海光农圃捐赠给人民政府，初期更名为东湖公园，范围即现在的听涛黄鹂小区至可竹轩一带，面积约400亩。

万流一上任后，带领职工在海光农圃安营扎寨，用沾满泥巴的双脚，丈量东湖每一寸土地。他们从老农那里收集有关东湖的种种传说，精心布局听涛景区，建设以屈子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系列景点：行吟阁、屈原纪念馆、长天楼、湖心亭、九女墩、湖滨客舍等。开放总面积达8088亩，东湖风景区世界级生态旅游区的雏形已经显现。

我记得，从1971年9月参加工作到1979年，听涛景区虽然已开放近30年，但沿湖仍是碎石路。湖对岸的磨山是果园，其湖畔的桥是铁路枕木做的，后来的楚城是民兵靶场，而落雁景区只是磨山植物园的一个苗圃。交通也很不方便，到东湖大门的只有公交14路车，经过磨山的也只有

公交36路车，半个小时一趟。景区打理仍以人工为主，为果树打药用粪桶挑水，植树栽茶用铁锹锄头。因此，东湖职工在人们眼里就是农工。

兴建磨山楚文化旅游区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东湖规划和建设迎来了美好春天。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区，东湖跻身其间。

为落实国务院加强风景区管理的精神，武汉市进一步理顺东湖管理体制，1985年成立东湖风景区管理局。此前，东湖风景区管理处为县团级机构，却要管理包括33平方公里水面的88.2平方公里区域，周边与洪山区、武昌区、青山区相接，沿湖还有部队、医院、疗养院、学校等单位，诸多属地问题无能为力。较长时期，“三管三不管”的状态，严重制约了东湖风景区的发展。

东湖风景区管理处升格为东湖风景区管理局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大手笔重新规划东湖风景区，风景区建设迎来扩大和升级。

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王杰多次来“陶铸楼”召开专题会议，规划开发磨山楚文化旅游区。很快，朱碑亭耸立磨山山头，磨山环山道路由武汉



1958年建设的屈原纪念馆



1971年作者在行吟阁留影

驻军共建完成，磨山盆景园、杜鹃园相继开放，磨山苗圃建起楚市、楚城、楚天台、楚才园，一举发展成为特色显著的楚文化旅游区。

听涛景区丰富景点内容，观鱼池、寓言雕塑园先后落成，重建、重修了先月亭、可竹轩、多景台。此后，又陆续落成吹笛景区（即马鞍山森林公园）和落雁景区。

1998年，市委、市政府将东湖风景区管理局由事业局改为行政局，进一步提升其管理能级，强化了对辖区的统一管理。随之，加大对东湖风景区保护力度，针对环湖出现的无序行为，实施专项整治行动，由分管副市长涂勇牵头组成指挥部，又多次在“陶铸楼”召开协调会推进整治行动。我作为宣传组的负责人，协同报道了全过程重要动态，亲身感受这次专项整治，不仅有效遏制了长年累积的种种乱象，还在十里长堤开发了新景点，为日后东湖环湖路改造、建设绿道夯实了基础。

打造东湖绿道

党的十八大后，市委书记阮成发等领导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适应时代的新要

求，大力推进东湖绿道和白马景区建设，向“绿色东湖”“生态东湖”迈进。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更加注重保护东湖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同时实现建设资金多渠道、经营形式多样化，形成了强大合力，美丽东湖愈加呈现独特魅力。

2006年，东湖风景区管理局升格为管委会，管委会一把手由副市级领导担任，有利于加强全面管理和宏观协调。当年6月1日管委会挂牌，建设部领导赵宝江和省市领导杨松、苗圩等参加。

建设东湖绿道，首先必须建设“东通道”。由于武昌城区迅猛扩张，东湖很快由“城郊湖”变成“城中湖”，东湖环湖路相应变成社会车辆穿越东湖的主干道。每遇春秋旅游旺季和节假日，堵车数小时、交通瘫痪已是常态，出现东湖不该有的“一景”。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这一瓶颈问题，又不减少东湖水面面积和影响水上风光，2012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一条穿越湖底5公里的东湖隧道，三年后顺利建成通车。

东湖隧道的开通，不仅使东湖环湖路还路于游客，而且揭开了东湖风景区提档升级的新篇章。可以说，东湖隧道通车之日，就是东湖绿道建设启动之时。

2015年12月，东湖绿道（一期）以郭



1984年军民共建东湖磨山环山路



东湖绿道湖中曲径

郑湖、团湖环湖路和磨山环山路为基础，正式破土动工，仅用一年时间建成全长 28 公里的绿道，实现了游人漫步湖边，畅游湖中，走进森林登上山顶的愿望。由此，东湖绿道 2016 年荣获联合国“世界人居环境奖”。

2017 年，东湖绿道（二期）全面开工，环绕汤凌湖、伍家湖、后湖、喻家湖、菱角湖、马鞍山，全长 73 公里，使绿道总长度接近 102 公里，成为武汉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一张亮丽名片。

东湖隧道和东湖绿道双双建成，使东湖环湖路的主体功能得以凸显，湖底车辆川流不息，湖面游客欢声笑语。对此，历任落雁景区筹备处组长、磨山处党委书记、风景区建设局局长的“老东湖”彭雪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感慨系之。他回忆说：上世纪 50 年代，东湖沿湖是没有路的，磨山一带的生产、生活出行，主要靠划木船解决；黄家大湾、落雁片区，得靠走土路绕道去青山解决。

到 60 年代初中期，市政府动员市民修筑了全长约 18 公里的湖心路和环湖堤。同

时，修建了进出环湖路的黄家大湾路（即现在的落雁路，长约 6 公里）、邮电路（即现在的喻家山西路，长约 3 公里）、鲁磨路（长约 4 公里）。60 年代末，基本形成了东湖风景区环湖路的雏形，但直到 80 年代中期都是碎石路面。此后，陆续加铺沥青或水泥路面。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东湖各子湖的水系相通，在环湖路修筑时沿线修建了 10 座桥涵。

如今，进出东湖风景区的周边道路日益完善，先后建成八一路延长线、武汉大道（东湖路）、三环线东段、青王路、欢乐大道等，其路面等级与先进标准接轨。

随着东湖绿道对公众开放，朱老总当年题词的愿景已变为现实，美丽的东湖成为劳动人民十分喜爱的优美文化区和风景区，同时吸引众多四海来客踊跃观光。

童汉芳，东湖风景区管理局党委宣传部原部长

旧时武汉商行的行话暗码

◇ 杨普社 张丽琴 熊恒多

武汉旧时商行洽谈生意，经常使用一些外人听不懂、弄不明的“橘子”或“市头隐语”，借以遁辞隐义、谲譬指事，久而久之自成体系，故称行话暗码。

行话暗码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符号，具有封闭式、半封闭式特征，如“橘子”的橘，由“谲”字的谐音演化而来，意即每一局交易中玩弄妙语隐约其词。清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云：“行栈贵人最软和，每逢生意巧张罗，局中明白旁人味，说话由来橘子多。”就是对当时说行话、讲暗语、打橘子的真实写照。

行话暗码有行外行内之分。行外的讲通用行话，如假货或劣质货叫“水货”，滞销的货叫“搁货”，对手成交叫“对手搏皮”等；行内的具有一定隐秘性，行外人一般分不清，用以维护业内的利益。

这里以菜瓜等商行的交易为例，对行话暗码作一些解析。

商埠发达商行兴起

行话暗码由“行”而生，因“帮”而兴。行商坐贾，区别“行”与“帮”。行商（贩子）是行帮的萌芽，行商与行商组合形成行帮；坐贾既是开商行的老板，也是行帮的组织者或组合者。

明清时期，武汉三镇水陆两路货运畅通，发展成为重要商埠，粮行、油行、棉行、杂货行、盐行、茶行、药行、纸行（也称皮行）八大行业齐现。以经营肉、鱼、蛋、菜、瓜、果等行，则起步较晚，创建最早的是猪行、鱼行、瓜菜行。

1668年猪行初现，1736年猪行开始有



旧时的菜市场

了坐贾。开办最早的数汉口猪行，位于江汉关附近，贩子大都来自河南的驻马店、南阳、信阳和湖南的长沙、汨罗、株洲，也有湖北的监利、老河口、襄阳等地。

鱼行次之，开设时间可追溯到1745年。起初是“鱼花子”（鱼贩子）沿街叫卖，后在汉口四官殿、汉阳杨泗港、武昌鲇鱼套、夏口县（今江夏区）金口等沿江码头一带，撮箕行（水产品扎堆场所）产生。1861年汉口开埠后，丹麦、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等国商人接踵而至，海产品大量涌入，龙王庙、集稼嘴、河街成为洋人商铺的集散地。沿海地区的海产品也逐渐进入，市场贸易渐趋旺盛。到1869年，鱼行派生出虾行、蟹行、龟行、海鲜行及鸡鸭行和蛋行（后鱼行更名为鱼蛋行）。截至1933年，武汉共有鱼行101家。

瓜菜行排名第三，并有水路与陆路之分。水路始于1816年，第一家姚公茂瓜菜薯行，位于武昌文昌门外鲇鱼套附近的王惠桥边。鲇鱼套因长江水流迂回平缓、港地弯曲，商船多停泊在此，形成了有名的水陆货运码头与商业批发交易集散地。陆路则起

源于清道光末期，汉口昇平街就有非正式的露天菜行，民国初年正式成立唐发兴瓜菜行，为陆路第一家。此后，汉阳瓜堤街的瓜行纷纷创立。

至此，业内一些简单行话暗码，被用心的本地菜农听懂，逐渐丰富而盛行。菜农把菜卖给菜贩时，常常撇开菜行用暗码交易，成交时请街头摆烟桌的商人代秤，代秤商人每百文抽三文

钱左右，《汉口竹枝词》就有“银钱兑换一毫争，钱桌当年获利频，此事近来收歇半，一张烟桌菜中人”的记述。

瓜菜行的花色精细菜（叶菜、茭笋、莲藕、洪山菜薹、葱蒜及茄果、豆类等），主要以郊区地产菜为主；大路菜（大白菜、包菜、冬瓜、西甜瓜等），则来自河南西平、遂平、信阳一带。武汉周边的汉川、沔阳（今仙桃）、嘉鱼、黄州等地区，也是主要来源之一。

20世纪30年代，武汉三镇有牌号可查的瓜菜行44家，40年代末发展到82家，另有水陆交易菜场28处。同时，汉口的硚口、永清、民族路三地，先后设立蔬菜批发市场，以消除露水集市的脏乱差。

1906年以后，牛羊行等商行产生。第一家羊行数武昌卓刀泉的马家庄羊行，其次是汉口头道街的江岸羊行。这两地都是河南周口黄泛区灾民迁居的集聚地（旧称“河南棚子”），因回民较多，由自养自宰自食，发展到产销并行。牛行与羊行同一时期产生，最早的一家在汉阳十里铺牛坊湾，之后在汉口球场街、广益桥、十字街、西大街相

继出现。1938年牛羊行达50余家，1949年后发展到110家左右。

1931年起，鸡鸭行、蛋行也逐渐兴起，瓜菜行的行话暗码由此延伸，被产销双方所熟悉。

商行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随行就市，组织买卖双方暗码开价，经纪人从中抽取佣金。为了抢生意，各行还雇请“代头”（瓜菜行的菜贩子）、“头佬”（猪行的猪贩子）等经纪人或线人，到产地揽货源，获利部分按比例分成。在零售环节，菜价沿袭“鲜鱼小虾，提篮作价”的习俗，“新货上市如跑马，早晚菜市价不同”。

五花八门各有玄机

行话暗码是交易行为中派生出来的特殊语言，讲究避凶趋吉，以求生意兴隆。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行话暗码，因年代、群体、品类不同而大异其趣。

行话暗码虽然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都离不开其构成手法和每个字的形、音、义的个性成分，利用拆字修辞法和形象寓意法来破解，就可一目了然。如拆字修辞法，将“一、二、三”叫做“旦、竺、川”，具体暗语为“旦底、竺音、川横”，因为“旦”底为一，用的是拆字法；“竺”音第二声，用的是汉语拼音法；“川”横放为三，用的是形态

修饰法。而形象寓意法将“一、二、三”叫做“扁担、筷子、三脚架”，派息扁担无论竖起或横放都为一，筷子用餐时为二，三脚架支起就是三。

行话暗码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手势暗码、口头隐语、数字暗语三种类型。

手语暗码类似哑语，就是双方用手指比划数字或在袖笼子里触摸指头来传递信息。手势暗码最初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穿着大褂大袖，“袖笼子交易”不被外人发现。最常见的是牛行、粮行的经纪人，为协调价格上的争议，分别与双方在衣袖里比划价码，把卖方的要价加上自己想要的佣金暗中传递给买方，讨价还价反复比划，直至生意成交。整个过程，买卖双方均在暗处，都明白经纪人从中取利但又不说破，为当时整个社会认可。

口头隐语就是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利用拆字、打谜语、歇后语、藏头词等，玩弄妙语隐约其词、隐伏其事、回互其辞、假以他词推演本意。如粮行的掺水叫“加



晚清时期的菜品交易市场

酒”，掺杂叫“添饭”；牛行的“递码”叫“摸手”，“有利取”叫“戴帽”，“拿钱”叫“造宝”等。

数字暗语多采用谐音式和会意式设置暗码，从1到9都有不同的行话表达。如粮行为“牛、地、人、工、大、王、主、井、羊”，果行为“牛、月、汪、则、中、和、壮、利、秋”，菜行为“叶、来、泡、插、拐、烫、西、占、求”，牛羊行为“留、撇、品、格、半、搔、捏、叉、勾”，瓜菜行则为“叶钱、文老、一炮、茶官、咀官、烫官、西官、占官、求官”，逐步延伸到鱼行、肉行、果行等行业。

数字暗码大行其道

为寻找用得最多最全的行话暗码，笔者先后走访了原洪山区蔬菜科学研究所生产队长匡己丑（1949年出生）、原汉阳拦江堤小学教师陈兴智（1942年出生）等老人，据他们介绍，武汉菜行交易中，数字暗码用得最全，把100以内的数字都换成别的字词来隐喻暗示。

1-9的暗码：1叶钱，2文老，3一炮，4茶官，5咀官，6烫官，7西官，8占官，9求官，此为正码。还有5个副码：1牛，2文、辰、边，3选，5角斗、咀，9底，可对照正码轮换配套使用。

10-99的暗码：10-19为叶钱、叶辽、叶神、叶显、叶茶、叶拐、叶烫、叶西、叶占、叶底，20-29为文老、边辽、边边、边显、鸡照、一壶、来烫、来西、来占、来底，30-39为一炮、炮辽、炮神、两炮、炮茶、炮壶、炮烫、炮西、炮占、炮底，40-49为茶官、茶辽、茶神、茶显、两茶、茶壶、茶烫、茶西、茶占、茶底，50-59为咀官、咀辽、咀神、咀显、咀茶、两拐、咀烫、咀西、咀

占、咀底，60-69为烫官，烫辽、烫神、烫显、烫茶、烫壶、两烫、烫西、烫占、烫底，70-79为西官、西辽、西神、西显、西茶、西壶、西烫、两西、西占、西底，80-89为占官、占辽、占神、占显、占茶、占壶、占烫、占西、两占、占底，90-99为求官、求辽、求神、求显、求茶、求壶、求烫、求西、求占、求底。

100的暗码：一百、叶钱。

仔细分辨上述数字暗码，不难发现有的同一暗码，代表不同数字。如“叶钱”既为1也为10还可为100，“一炮”可为3也可为30（而圈外人视一炮为10、三炮为30），“茶官”可为4也可为40，“咀官”为5也可为50，“烫官”为6也可为60，“西官”为7也可为70，“占官”为8也可为80，“求官”为9也可为90等，这与货物的体量大小紧密相关，局中人心领神会。

总之，在旧时商行的交易中，如果学会用行话暗码，别人以为你是同行；行话暗码很地道，别人就不敢搞猫腻；行话暗码不在行，则很容易被不良商贩所蒙骗。

1949年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市场实行公开公平交易，行话暗码退出历史舞台，沉淀为我们研究商业文化的一种史料。

杨普社，武汉市农委原党组成员、总农艺师；张丽琴，长江蔬菜杂志社副社长、江汉区农工民主党工委主委；熊恒多，武汉农学会秘书长